

編者的話

讀者同志們！工人同志們！《工人家譜》是我社繼《血淚春秋》出版之后，又選編的一本家史。

旧中国，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，經濟很落后，現代工业无产阶级人数不多。所以，我国工人阶级的前身，多数是破产农民。本书所反映的事实，正真实地說明了这一点。

《工人家譜》通过煤矿、机械、紡織、铁路、邮电、公路运输等行业中十二个老工人血泪斑斑的史实，有力地控訴了帝国主义、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殘酷压迫和剝削。同时，真实地記述了工人阶级在苦难的岁月里团结友爱、互相帮助的动人事迹，也热情地歌頌了中国工人阶级頑強斗争的英雄气概。

在反动統治年代，多少阶级弟兄死于帝国主义、国民党反动統治的屠刀和资本家的皮鞭之下。为了生存，他們前仆后继，向敌人进行了宁死不屈的斗争。但是刀把子在敌人手里，因此仍免不了忍飢受餓，妻离子散，家破人亡。新中国

成立后，我們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工人阶级已由旧社会的奴隶，一跃而成为新中国的主人！

今天，我們厂矿企业里的青年职工，沒有或很少亲身經受过阶级剝削和阶级压迫的痛苦，缺乏阶级斗争的锻炼。我們试图通过《工人家譜》这本书，运用回忆对比的方法，給青年职工补上这一課，让青年人認識过去，了解过去。这本书对于青年学生，也是一本非常深刻的阶级斗争教材。

“了解昔日苦，方知今日甜”。只有恨得透，才能爱得深。不少老工人反映，不回忆对比，思想和过去断了线，時間长了，人就会变质；一回忆对比，就像喝了清凉剂，头脑清醒了，眼睛豁亮了，阶级观点增强了，就会更加热爱党，热爱新社会，就会用最大的革命热情去对待社会主义建設。老一輩尚且如此，我們青年人，更應該把旧社会的阶级苦难和阶级仇恨永記心里。并把这种仇恨化为前进的动力，讓我們在阶级斗争，生产斗争，科学实验三项偉大的革命运动中，鼓足更大的革命干劲，贡献出更大的力量！

这本书在編选过程中，得到了各厂矿企业党委宣传部、县委宣传部和有关部门同志們的大力支持，特别是《河南日报》工商部的同志們，在稿件选取、文字加工方面，都帮我們作了不少工作，特在这里一并致謝。

由于我們政治思想水平不高，书中难免有不妥和錯誤之处，我們殷切地希望讀者在讀了这本书后，提出宝贵的意見，以便改进我們今后的編輯出版工作。

一九六四年三月

目 录

- 矿工家譜……………鹤壁矿务局陈家庄煤矿工人 王春明 (1)
- 五十年来恩仇記……………焦作矿山机械厂工人 柴忠学 (22)
- 十三条人命的血泪仇……………洛阳轴承厂工人 楊发祿 (32)
- 痛忆惨死的八个儿女……………郑州国棉三厂女工 刘小妹 (44)
- 三千里流淚記……………郑州紡織机械厂工人 宋福山 (54)
- 国仇家恨不能忘……………新乡中原紡織厂工人 赵錫海 (60)
- 两条腿的血泪仇……………漯河市残废工人 敬文升 (71)
- 风雨漂泊苦邮差……………郑州市邮电局包裹班班长 李运成 (76)
- 血泪斑斑忆当年……………許昌公路运输公司工人 邢士荣 (81)
- 三代春秋两个天……………中共新蔡县搬运站支部書記 赵文德 (89)
- “二七”罢工后的日日夜夜
……………郑州鉄路局車輛南段退休老工人 刘 桐 (97)
- 誓死不屈
——記“二七”老工人李全德的斗争事迹……………江 涛 (112)

矿工家谱

鹤壁矿务局陈家庄煤矿工人 王春明

我家住在安阳县善应村，西依太行山，北临善应河。家乡的土地，大部分被两户地主、六户富农占去了；穷人没地种，只好下煤窑。我家人老四辈都下煤窑，现存的一盏破油灯，一顶烂毡帽，还是我老爷（曾祖父）留下来的。

四代下井人

我家四代人下窑，九口人丧命。我老爷下煤窑，被砸死在井下。为了生活，爷爷擦干眼泪，提起破油灯，戴上烂毡帽，又下井了。干了几年，不幸井下冒顶，又被闷死在里边。我爹那辈，弟兄四个，我这一辈，二弟和三弟，都死在井下，连我的未婚妻宝玉花，也是被吓死的。

我大伯王邦印，下了草湖地煤矿。这个矿的资本家，光

願采煤，不願花錢買木頭架棚，頂板齜牙咧嘴，經常往下掉石頭。大伯質問了資本家好几回，資本家口頭上答應着買，可就是光敲梆子不賣油。大伯明知道有危險，可家裏有幾張嘴等着吃飯，不下井不行啊！還是硬着頭皮下井了。結果大伯被活活地砸死了。

二伯王來柱，生來骨架大，是個地地道道的硬漢子。人家拉一百斤煤上山直喘粗氣，他拉一百五十斤，氣不喘，臉不紅，碰到別人拉不動時，他還幫一把。有一次，看見一塊石頭正要往下掉，他手急眼快，一膀子扛住，說聲“快！”人們一個箭步跳出險境，我二伯鬆開膀子，石頭才落了地。人，再硬的身子也是肉長的，終久是碰不過石頭。那一年，他在安陽水冶下坡煤窑下井，有一次大冒頂，一下子悶死在窑裏了。

我爹王金柱，排行老三，一直在煤窑上干活。我九歲那年，爹下窑，一天干十二個小時，才給二斤米。一天二斤米，爹、媽和我們弟兄四個，實在無法維持生活，萬般無

奈，爹把我拉到他跟前說：
“春明，你是老大，家裏實在沒辦法啊！爹給你找個吃飯的地



方吧！”說着就把我送到地主申万富家。

申万富是个有名的“笑面虎”。我刚到他家，他就把一头大犍牛、一头母牛和一头小牛犢交給我放。这三头牛老的老，小的小；有的走得快，有的走得慢；有的性子躁，有的性子拗。我这个九岁的孩子，真是放不好。有一天，走到半路上，牛一歪脖，吃了申天宝地里的谷子。这申天宝是村里有名的“惹不起”。真是冤家路窄，他正好在路边看見了，拿着棍子沒头沒腦地打了我一頓。打一頓还不算完，硬要叫申万富賠二斤谷子。申万富本是个抱着元宝跳井——舍命不舍財的家伙，他不但不賠，反而在我身上出气，提着棍子在門口又打了我一頓，最后逼得我媽沒办法，到地里費了很大勁，拾了二斤豆子賠給他，才算了結這場灾难。

我每天放牛早出晚归，一到天黑，累得渾身酸疼，又渴又餓。到吃飯的時候，地主婆看見牛肚子鼓着，就給我两个紅面饅，要是牛肚子不鼓，我連飯也吃不上。就这，申万富的小老婆还叫我刷鍋、洗碗、倒尿盆。有一次，我失手打了一个碗，她就打了我个半死。我想，任凭拉棍要飯，也比受这窝囊气强。我就离开了申家。

到我十一岁，爹的身体越发坏了，才四十三岁的人，面黃肌瘦，咳嗽不止，不能經常下井；就是下井，掙的米也不够吃。实在沒办法了，爹又一次把我叫到他跟前說：“孩子，跟爹下窖吧，不然，就要餓死。”我經常看到从井下往上边抬死人，又看到爹累得那个样子，一听叫下窖，就說：“爹，我害怕！”我这一說，爹掉泪了，媽也哭了。爹紧紧地摟住我說：“孩子，不是爹娘不疼你，你是老大，累点总比餓死强啊。”

我跟爹下井了。从这以后，我在井下整整熬过了二十八个年头。

第一天下井，我坐在爹怀里，爹坐在绳套上，转悠转悠地下到井底。几十丈深的井下，到处往外渗水，巷道里有壟沟，隔不远有一个小坑。把头给我一个柳斗，叫我从坑里往老巷掏水。一个柳斗，能盛十五六斤水，把头叫我保证这一个水坑流不满。好容易干了十二个小时，升了井，身上的关节好像散了一样，咋着也不好受。见了妈，我哭，妈也哭，爹含着泪说：“好孩子，别哭了，爹也是十一岁就开始下窑，过几天就好啦。”第二天，增加到两个水坑，第三天增加到三个，一直增加到五个。我两只手提着两个柳斗，另外挤出一个指头提着灯，我马不停蹄地跑着，提了这个坑的水，那个坑的水往外流，汗流到眼里也顾不得去擦。就这样，总是有三个坑往外流水，眼看着巷道里的水有脚面深了。

我正忙得不可开交，把头王黑雷来了，他乘我低头打水的时候，照准屁股冷不防打了一闷棍，我一头栽到坑里，没等我起来，乒乓又是几棍子，立时打得皮开肉烂，我却哭不出声来。王黑雷还瓮着嗓子说：“别人都能提完，偏你提不完，耽误几十车煤拉不出来。今天念你初犯，扣你一天工资。”就这样，我累死累活干了一天，只落了儿棍子。

惨死的伙伴

过了一年，我到水泉沟矿拖筐拉煤，一个小车拉五十斤，我拉不动，就跟我们村里的王林贵、王翰海三个孩子合起来，包了两个煤车。在井下拉车，一个班拉三十车煤，三

个人得四斤米，拉不够不能升井。拉上山煤时，我拉一个小車，輪海拉一个小車，林貴輪流給我們推。有一天，輪海拉完了十車煤，找了个黑地方，刚坐下休息，因棚子年久失修，唿隆一声，煤牆片帮了，掉下一块大石头，正好压住輪海。我和林貴聞声急忙趕去搬石头，輪海的腰已被压断，空张嘴哭不出声来。我們架着輪海升了井，去找資本家张好林。张好林是这一带的伪区长，起初把門的門警不叫进，我說：“出事了，非找张掌柜不行。”张好林出門来不耐煩地說：“找我干啥？”我說：“砸伤了人你管不管？”张好林根本就沒把我們这几个童工看在眼里，开口就說：“下井是你們自己来的，不是我拿八抬大轎請来的，我不管，到哪个衙門口告我都行！”我們年龄小沒办法，只好把輪海送回家。輪海的奶奶、媽媽两輩守寡，就这么一条根，因为沒錢治，十几天輪海就死了。

我和林貴埋了小伙伴，心里很难过，拖着沉重的步子，又回到矿上，俺俩合伙拉一个小車。有一天，我們从下山往山上拉煤，这个坡很陡，空手走还得两手着地往上爬，我們两个十二岁的小孩子拉着五十斤重的煤筐，实在够呛。我在前边拉，林貴在后边推，我一失脚，嘩啦一声，連筐带人一齐往下滚，林貴冷不防受到冲激，猛一下撞到煤牆上，失去了知觉。我滚了几丈远停下了，脚蹠了一个大口子，我也顾不得疼了，勉强爬到上边，只見林貴歪着头躺在煤壁边，上气不接下气地喘着，我急忙大声喊叫，可是不見林貴应声，我心里咚咚直跳，連忙背起林貴就走。在大巷里正碰上王黑雷。王黑雷用灯一照說：“啊！你們两个小鬼不干活，还在这里背着玩，劲头可不小啊！”我怕王黑雷不問青紅皂白就

打，赶忙說：“王先生，林貴出事了！”王黑雷提高嗓門說：“什么事，值得慌张！”“你看看就知道了。”我一边說一边把林貴放下。王黑雷用灯照了一下，小脸蜡黄，头上出血，脚也破了，可王黑雷仍毫不在意地說：“不要紧，划破了一层皮，一会儿就好啦。”說着用手抓了一把煤沫子，往林貴头上一揉，对我一摆手，“走，把他背上去！”到了井上，資本家照样不管，不几天林貴因得破伤风也死了。我又失去了第二个伙伴。

爹爹之死

在井下熬过了四年，我十五岁了，不光会挖煤，也学会了打井。爹是个下煤窑的全把式，采煤、砌窑，样样都中，打井筒更是在行。爹打井，我也跟着做二手活。在旧社会打井可不容易，沒钻机，全凭經驗。有一年，資本家看好一个地方，問我爹能不能保险打出煤来。我爹說，不十分保险。資本家眼珠一转，阴毒地說：“我現在錢还没到，干一个班先給半个班的錢，其余的等打出来煤再說。”这个井筒打了二十来丈深还不見煤，資本家宣布不打了，其余的一半工錢要賴不給，他說：“沒打出一点煤，我自己的几十石粮食都賠在里边了，还有錢发工資？”

爹是个老实人，受了这次騙后，总是悶悶不乐，到西山看了几天，找好一块地方，和更西叔他們十二个人合伙，自己打了一个小窑，挖五丈深，就出煤了。煤层虽只八寸厚，可人心齐，干劲大，每天还能挖一千二百斤煤，每人每天分一百来斤，换点粮食，掺点菜，日子还可以勉强过去。大伙

都說，宁可日子苦一点，也比給資本家卖命强。約摸有半个多月，井口上就堆了一大堆煤，爹干瘦的脸上，第一次現出了笑容。誰知这件事很快被伪队长刘玉生知道了，他帶了两个护兵，背着枪拿着鉄鍬，到我們开的井旁边打新井。这明明是欺負人，但又惹不起人家。我們不愿意叫他打井，他非打不中，还說：“和你們合伙干也行，我自己一股，你們十二个人一股。”他既不出錢，又不出人，每天挖出一千二百斤煤，刘玉生白白訛去一半，我們十二家每家只能得五十斤煤，生活顾不住呀！只好对刘玉生說：“把这口井送給你吧，我們不干了。”刘玉生沒劳力当然干不成，我們不干，他也不干了。

被刘玉生赶走後，我爹領我到拐头地煤矿，給資本家杜成斋打井筒，我爹下头班，我接爹的班。打井用的井繩，一般都是用皮做的，可这个資本家用的却是麻繩，并且磨得起了毛。工人們說：“东家，換根繩吧！”提了几次，資本家理也不理。我爹是个犟性子，几天不說一句話，說出話來能頂倒人，这次他真气极了，照着資本家的脸說：“买起馬就备起鞍，井筒都打了，还买不起一根繩？”資本家說：“你說大話不腰疼，我又沒开銀行，哪來那么多錢。”这一天，我买了两碗飯，自己吃了一碗，留一碗准备給爹吃。該交班了，井繩絞到中間，嘣地一声断了。我爹被活活地摔死在井下。

我把爹背到井上，已是深夜十二点了。我扑在爹的尸体上，总想着他老人家沒有死，他不能死啊！他死了，我們一家人可怎么过呀！深更半夜，守着爹的尸体，我这个十五岁的孩子，真是哭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。



第二天，天刚蒙蒙亮，媽領着几个弟弟从二十里外的老家赶来了，我們全家抬着爹的尸体，到杜成斋家去說理。杜成斋家門口把着两个崗，不叫我們进，我在門口

口吵，媽在門口哭，周围围了一大群人。杜成斋看着躲不过去，只得出来了。他一出門就毫无人性地說：“我花錢，你出人，死了怨自己不小心。”我說：“你要花錢买根绳，也不会这样。”“井绳不好你不会不下！”我当时年輕，缺乏斗争經驗，一时不知說什么好，杜成斋这个老滑头，叫門崗拿了几个饅給我，叫我回家。我想，爹的一条命，只值这几个饅？我气得抬手把饅朝杜成斋身上扔去，杜成斋扭头溜回家了。在那个时候，哪有穷人說理的地方啊！

七十条人命

爹死后，看着他老人家留下的破油灯，烂毡帽，全家人发誓不下煤窑了。可是五口人的生活怎么办呢？在旧社会，大小道路千万条，哪有穷人走的路！正在这时候，我四叔王銀山从三杆枪煤矿回来了，他看着我說：“还是下窑吧！到三杆枪，你下一个班給二斤米，煤山下一个班給一斤米，先湊合着顧住嘴再說。”实在没办法啊！媽合計着，四叔說的

也对，于是我带着十一岁的弟弟煤山，与四叔一道，下了三杆枪煤矿。

三杆枪煤矿是鹤壁一带的大矿，每个班下井七十多人。干了几个月，井下水渐渐的多起来了。我双手捧了一些淋帮水，放在嘴里尝尝，味道很苦，根据以往的經驗，我想：地下水是甜的，现在水是苦的，离这不远一定有老窑存水了。我又走到掘进头，里边森凉森凉的，我用手贴向煤壁，整个胳膊都冰凉，好像触电一样。我觉得危险，很快就要出事了。

我勉强干完这一班，升井的时候，已是半夜。我四叔和煤山来接班，我把井下出水的现象向四叔说了说，叫他这几天不下井，四叔有些犹疑。这时候，把头催我四叔赶快下井，四叔想了想说：“先下这一班，看看再说。”他一面说着，一面拉着煤山下井了。

我回到住处，吃罢饭正想睡觉，听到外面乱嚷嚷的，说是井下出事了。原来这一班人下井，放第一茬炮的时候，一炮崩透了煤墙，老窑存的水顺巷道往下直灌。工人们齐往井口跑，有的抓井绳，有的跳上起重筐，都想逃出井口。正在这千钧一发的紧要关头，起重井绳唰地一声断了。后来才知道，这井绳是资本家李贵砍断的。那李贵本是个伪军官，平时杀人不眨眼，他站在井口，听着井下的吵嚷声，他估计井下这七十个人，若是设法抢救，能救出一半；但他又想，这些人一出来，可不是好惹的，一定要闹事。想到这儿，他手拿斧子，对准起重井绳，三斧两斧把井绳砍断了。然后他朝着两个绞车工说：“这事要透出风声，我要你们的脑袋！”

井下渐渐没有动静了，七十条人命完全死于井底，死在

資本家李貴的手里。工人家屬聞風趕到，齊哭亂叫地找李貴要人。我到井口看了看，只見二十多丈深的井筒，水漲得離地面只有三丈深了。黑黑的井水，吞噬了七十个階級弟兄，吞噬了我四叔和二弟，悲傷、仇恨一齊涌向心頭，我真想抓住李貴狠狠地咬他几口。可刀把子在人家手里，有什麼辦法呢？那天，我無可奈何地離開了三杆槍煤礦。

圈套——人間“地獄”

四叔和二弟死後，我又一次發誓不下煤窯。真是像俗話所說的，屋漏又遭連陰雨，船破偏遇頂頭風。緊接着，一間破房子也被保長王合訛去了。一家人連個落腳的地方也沒有了。故土難舍，但為了生活，全家人忍受着剝心的疼痛，離鄉背井，流浪到太原。在太原人地兩生，舉目無親，哪里是個安身之處，實在沒法，全家人就在城外找了一個土窯洞住下了。有一天，我到城裡想找個出力的地方，剛進南門，碰見一個穿洋服的人，他見我就問：“苦力的，想干活嗎？”我說：“想干。”心裡想，真是時來運轉，找不着碰着了。那人接着說：“干一天給一元二角錢，跟我走吧！”我說：“還沒有吃飯。”他就順手給我四個白饅。拿着白饅，我把兩個放起來，準備給媽和弟弟吃，剩下兩個，我一邊吃一邊等着。不一會，那人帶着十來個人來了，說一同到北門外去干活。誰知把我們弄到鐵閘子火車上後，門一鎖，火車一個勁地開起來了，從正晌午一直開到天黑，車才停下來。

一打開車門，兩個日本兵端着槍把我們叫了出來，押到一個土屋裡又把門鎖上，門口還站了崗，不准出入。該吃飯

了，提来一桶水，每人分两个紅面饅。夜里，北风呼呼地刮着，我們都穿着单薄的衣服，冻得睡不着觉，背对背地坐着。一夜之間，脚都冻肿了。

第二天，日本鬼子拿着枪，把我們押出来，只見四周崗亭林立，周围是一层一层的鉄絲网，外加一层电网，活像个大監獄。

日本兵把我們押进一个斜煤井，井口是个鉄柵門，鉄門上拴着一个大鉄鏈，鉄鏈上边有个很大的鎖，我們进去后，門又鎖得紧紧的，門口还站着—个日本兵。我們走到井里，里边又悶又热，又腥又臭，工人們都光着身子，連个破毡帽也沒有，有的挖煤，有的抬煤，动作很慢，都好像喝醉了似的，走起路来搖搖晃晃，有的倒下去就起不来。他們看到我們这些新来的人，都露出同情和惊奇的眼光，問我們从哪里来的，我們回答是从太原被騙来的。后来才知道这就是大同的圈窑。

圈窑真称得起人間“地獄”，二十个人有一个工头跟着。这工头不是一般的工头，他們腰里掖着枪，左手拿棍，右手拿皮鞭，輕者打皮鞭，重者一棍打个半死，如有半点反抗就地枪杀。

在阴森森的矿井里，誰也不說一句話。一天送两次飯，每人两个紅面饅，提去一桶凉水。后来每頓飯給一碗黑豆，黑豆配凉水，井下工人沒有一个不拉肚子的。每四个小时工头換一班，工人稍稍喘口气，就又接着干。在井下不知道白天黑夜，一連干七天七夜不能睡觉。有时干着干着手一挂鑊头就睡着了，工头見誰站着不动，过来就是一闷棍。我亲眼看見每天总得打死一两个人，人死了往老塘里一扔就完了。

千够七天，才被工头押着走出井口鉄門，晒晒太阳晾晾风，晒够三个小时，又被押着走进斜井的鉄門，再千七天七夜的活。

什么时候才能逃出这个吃人的牢籠？这念头一直在我脑子里回旋着。

我第二次出来晾风的时候，由于在井下缺少营养、不見阳光，一出井口，觉得天旋地轉，阳光好像万道銀絲，刺进眼睛，刺进腦髓，看不清什么东西，我閉了閉眼睛，还是一样。在井下想見阳光，这时又怕見阳光了。

下了井虽然好一点，可是眼睛总是看不清，头也发胀。和我在一起挖煤的人，沒多天就死去五十多个。我虽說沒死，头上身上也挨了不少棍子，到現在还留着伤疤。

有一次，工头派我和董其貴上井拿筐，在半路上，我問董其貴：“咱們想个办法跑吧？”他說：“要是跑不脫的話，不是电死就是被打死。”我說：“反正是死，死在井上比死在井下强，碰巧了还能逃条活命。”“对，咱們看机会。”董其貴答应着。两个人来到井口，正是午夜，把門的日本鬼子，抱着枪正打瞌睡，我輕輕地拉了下鉄門，一个鉄鏈子連着两扇門，不是那么紧，我又把鉄鏈子松了松，鉄門出現了一条縫儿，我在董其貴耳边輕声說：“拉！”董其貴使劲往两边掰着两个鉄門扇，我扁着身子挤出了門；接着，我掰着門，董其貴也挤出来了。我們輕輕地走出去，把門的日本鬼子并未发觉。俺俩出了井口，在院子里的黑暗处轉了一圈，都是电网，便发起愁来；又轉了一圈，看見一个水沟，沟里有一团乱鉄絲网，我用大棍一挑，把鉄絲网弄到一旁，我們钻出来了。两个人钻出电网，好像出籠的鳥儿，猛

跑起来。跑了約五六里地，看看后面沒有人追，才停下来休息。我問董其貴：“你是哪儿人？去什么地方？”

“我是东北人，要回东北。”我



說：“我媽和弟弟在太原，我要回太原。”两个患难弟兄，也沒有什么作个紀念，互相磕了一个头，两个人交換了地址，說了声“后会有期”，一个往南一个往北各自走了。

死里逃生

剛剛逃出来，心里总是害怕，再加上眼睛怕見阳光，我就白天找个麦秸窝睡覺，晚上走路，走了几天才到太原北門。那天天已經亮了，眼睛也漸漸的适应了阳光，我多么想見媽媽和弟弟啊！我的脚步越来越急了，心里也越来越紧张了，家里是什么样子的呢？

我正走着，身旁一輪卡車猛地停住了，从車上跳下来几个穿綠衣服的人，嘴里喊着：苦力的干活！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把我架上汽車，嗡地一声汽車又开走了。开到一个有电网圍着的平場子里停下来，把我推下車，給了一个鉄鍬就叫干活。

隆冬寒天，北风呼呼叫，我穿着不能遮体的破单衣，戴

着一頂爛毡帽，光着脚，身上像刀子割一样。該吃飯了，吃的是紅面饅，喝的是半溫水。工人們个个餓得面黃肌瘦。日本鬼子却吃大米飯、豬肉，他們吃不完就倒在猪槽里。

这是給日本鬼子修飛機場。場內住着很多鬼子，他們訓練狗，專門对付勞苦工人。日本鬼子先扎一个紙人，穿上破爛衣服，里边裹着一块肉，鬼子一指，狗就扑向紙人，三扑两扑把肉抓出来吃了。慢慢地狗就抓工人了。日本鬼子訓練了四五条大狗，他們在工地带着来回乱窜，用来代替監工的。鬼子常牽着狗，站在高崗上向周圍看着，見誰不抬着筐跑，就用手一指，狗一搖尾巴扑上前去，先一口咬住腿，然后再用爪子扒肚子。有一个老头走得慢了，日本鬼子一指，狼狗扑过来，一下抓瞎了他的眼，又是两下把腸子扒出来，血淋淋的腸子弄得滿地，日本鬼子还特意叫工人們看，企图杀一警百。我亲眼看見狗吃了几个人。有一次，我正在干活，日本鬼子牽着狗瞅着我笑，我真想赶紧躲开，可是已經来不及了。日本人一指，狗扑向我，一口咬住了脚脖，把我扯倒，我怕狗扒肚子，馬上一翻身趴下，双脚乱蹬，打了几个滾，才算沒有叫狗咬死。我的脚脖被狗咬掉一块肉，立时，鮮血直流，一个叫王海的工友馬上扶起我，找了一块洋灰袋紙，給我包扎起来。

每天掙扎在死亡綫上，我自己也害怕起来，狗咬了以后，更为伤心，决心冒险逃跑。

这天夜里，我沿着电网看了一圈，見有一个水沟，就順着水沟钻出电网，拄着一个棍子，一瘸一瘸地离开了这个杀人的刑場。

老虎矿上血泪多

走了半夜才到家，媽見我又瘦又癯，头发半尺长，摸着我的头說：“孩子！你这几个月到哪儿去了？”我把被騙下圈窠、被抓修飞机场的事說了一遍，全家哭起来了。哭有什么用，沉重的生活担子，逼着我又东奔西跑去找活干。沒找到活，碰到了两个老乡，一个叫王富貴，一个叫王良，他俩对我說：“太原西三百五十里远，有个老虎須煤矿，有采煤技术的，下一个班給一斤十二两米。”我在无路可走的时候，听到这消息，又高兴又害怕。回家和媽商量，媽也只好同意了。沒路費，媽把唯一的囫圇棹子卖了两块半錢，我拿着一块买了一张火車票，搭車走了。到煤矿后，很快就上工了。上了两个班，都是先一天領第二天的米。我估摸着，全家都到矿上，还比在太原强些。于是，我把媽和弟弟接到老虎須煤矿了。

老虎須煤矿，的确比老虎还厉害，这个地方的群众編了这样一首打油詩：到了老虎矿，老虎扑綿羊，侥幸死不了，也得身受伤。这里用鉄絲网围着，通了电。圈里除了日本鬼子住的是瓦房外，工人們住的是个大棚子，有家属的吊一张席子隔起来。夜里天气冷，棚子里四面透风，好像睡在露天一样。工人們偷点煤烤火，日本鬼子怕烧了棚，强逼着工人用水泼灭。晚上，孩子們冻得直哭叫。

在井下，誰行动慢了，工头掄起棍子就打。在井下累个半死，到井上冻个半死。原来說明給米，后来給成棉籽餅。工人們先是面黃肌瘦，慢慢地就浮肿起来，臉肿腿肿，走起

路来摇摇晃晃，一头摔在地下，口吐白沫，躺一两天就死了。

工人们一躺倒，工头就不发口粮，每天只给两个胡萝卜。工棚里每天总得抬三五个死人出去。死了人，工头叫工人把尸首抬到万人沟边，一扔，就算完了。这里大白天成群的狗，夜里成群的狼，到处乱窜着吃死人，胳膊腿叨得满地皆是。这沟里究竟扔了多少死人，谁也不知道。

每到晚上，带家属的更是倒霉。夜里，日本人拿着手电筒，满棚子乱窜，看见青年妇女就拉走。我住的工棚里有个青年工人，带着妻子和一个不满周岁的小孩，日本鬼子要抢他妻子，这个青年人刚要去阻拦，当场被杀死了，妻子被侮辱后上吊自杀了，小孩也饿死了。工人们气不过，就纷纷逃跑。日本鬼子怕跑人，就加强岗哨。上班时，日本鬼子端枪押着工人到井口，看管得很严。

我媽生病了，弟弟也生病了，我的腿直发软，也要生病，全家人眼看着活不成了。一天，媽对我說：“春明，趁咱有口气，赶快回家吧，死也把骨头埋在家門口。”我听了媽媽的話，于是，在一个漆黑的夜里，全家人逃走了。

斗争才能胜利

从太原坐火車回到安阳，踏上了家乡的土地，虽然还是一贫如洗，我們总算活着回来了。想到这一点，心里也稍愉快些。下了火車往西走，到了楊家疙疸，正往前走着，看见路旁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，在那里痛哭。我媽是个软心腸人，就上前去問那姑娘为啥哭，那个姑娘叫寶玉花，她哭着

說：“俺爹被地主逼得逼死了，俺娘也被逼得上吊了，无依无靠，只剩下我一个人……”听到这，我媽也跟着姑娘哭起来。

穷人和穷人心連心，哭了一会儿，又說了一会儿家常，我媽就对那个姑娘說：“俺家就在那边南善应村，也是穷得地沒一分，椽沒一根，你若是不嫌气，就跟我們一块儿过吧；你要是不愿意，咱們以后当門亲戚走也行。”寶玉花听了我媽的話，抬起头来看了看我們一家人，点了点头。就这样，我們回家的路上又多了一口人。

回到家，沒有了房子，全家人无处安身，只好在村头破庙里住下来。

生活还是沒有一点办法，只不过多了一张嘴。为了吃飯，我又干起了老行当，下了沙石湾煤窑。

沙石湾煤窑的资本家，名叫王三全，是皇协軍的头子，手下有一批反动武装。

王三全开这座煤窑，賺了不少錢，可就是拖拖延延的不給工人开工資，工人们都是沒有隔夜粮的穷人，哪能等得及？于是就成群結队地找他要工資，每找他一次，他总是推托說：“唉！我也是难啊，你們看，有煤卖不出去，等两天吧。”过两天，又去找他，王三全还是哭穷不給发工資。工人实在沒办法，我們就串連十来个人，想着非得設法治他一下不可。大家說，假若工人都一齐不干活，井下煤采不出来，水排不出去，給他来个淹井，看他发不发工資？我們商量好以后，第二天一齐不上班了。这一来，果然灵驗，王三全有点着慌，他派人叫工人上班，工人說：“肚子沒吃飽不能下井！”他知道这里有文章，就打听串連不叫工人上班的領头人。有个小把头給王三全透了气。王三全一听是我領的

头，可把他气坏了。

王三全派了三个皇协军，拿绳背枪，到破庙里找我，见了面不說青紅皂白，把我捆起来吊在树上就打。打了一頓又帶到皇协军队部，王三全亲自“审問”：“是你不叫他們上班？”“一人一姓，誰也挡不住誰，他們能听我指揮？”王三全說：“我就奇怪，为什么一齐不上班？”我說：“吃不飽咋能上班？”他說：“叫他們上班，馬上給他們开工資。”王三全把欠下的十三天工資都开了，唯独給我少开了三天的工資。我找把头一問，他說：“捆你那天，掌柜派了三个皇协军，費了三个工，所以扣你三天工資，这叫‘绳錢’。”我挨了打还得扣绳錢，天底下竟有这样不公平的事。

在苦难的共同生活里，我和玉花逐渐产生了爱情，媽也为我俩安排了終身大事。真是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就在我被捆走挨打的那天，我的未婚妻玉花也被吓得有了病，沒到三天就死去了。

血債要用血来还

一九四八年，我的老家南善应村解放了。我从煤矿回到家，参加了反霸和土地改革的伟大运动。我高兴得睡不着觉。在党的领导下，我和俺村的穷哥儿們，跟土改工作队一起，和地主恶霸接連斗争了一二十天。罪大恶极的地主王清平、楊楼子、王銀国，經上級批准，在本村枪决了。但地主王老香等随着伪軍逃跑了。

斗倒了地主以后，就开始分地。我家分了三間房子十亩地，还分了一头大牛。我在資本家鞭打之下，沒掉过泪；被

恶狗咬伤，沒掉过泪；就是父亲被摔死，叔父、二弟被淹死，我也很少流泪，都把泪水往肚里咽。这次，当我牵着牛回家的时候，我的眼泪却像泉水一样涌了出来。我感激党，我这个九死一生的人，终于活过来了。在党的温暖的怀抱里，生活有指望了。

一九四八年，这一带正是拉锯形势。国民党匪军和还乡团经常骚扰这个地方，我知道必须要用战斗来保卫这胜利的果实，在解放汤阴的时候，我们组织了担架队，大家选我当队长，几次战斗我都上了前线。

过了三个月，国民党的新五军反攻过来了，地主王老香和伪保长王合，也跟着回来了。当时我们农会干部还缺乏斗争经验，有些就不幸被捕了。王老香把他们一个一个地捆起来，拉到村东的老废井边，每人脖子上拴上一块石头，往井里一推，十二个干部和一些群众都被杀害了。我们暗暗地记下了这笔血债。

杀死干部以后，地主们开始倒算了，谁分了他们的地，不管收成咋样，每亩地要四百斤谷子。牲口、衣服也都倒算去了。可恶的地主阶级，比过去更凶恶地压在人民的头上。

又过了三个月，解放军全面反攻，我也跟着回到了家乡。经受了这次锻炼，使我更加热爱党热爱毛主席。我和其他干部领导群众重新分配土地，大家一致选我当了副村长。我这个在旧社会当了半辈子煤黑子的人，也管理起村里的事情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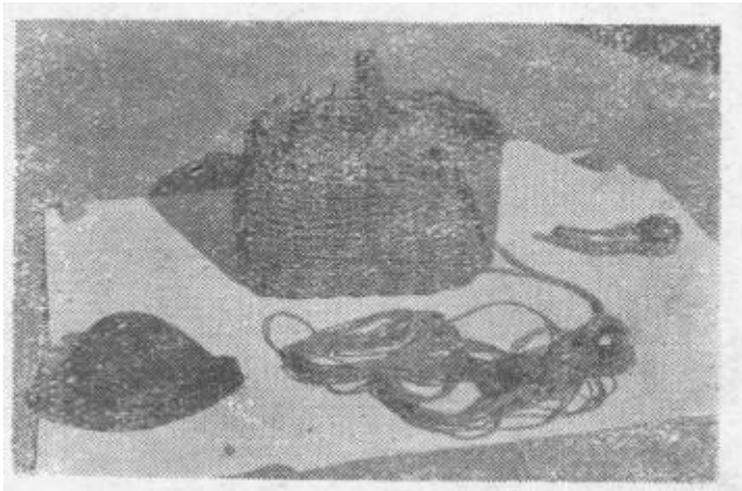
今日矿工甜

随着国家建设的需要，党号召煤矿工人回矿工作，我也想回煤矿了。有一天，我找正村长杨克文同志说：“伙计，我想回矿啊！”我这么一提，他说：“那一年你爹死了，你不是发誓赌咒不下窑了吗？为什么现在又想回矿啦？”是啊，我是不止一次地发过誓、赌过咒不下窑，但那是旧社会，那是给资本家卖命，当时为了生活，想脱离也脱离不了，现在搞社会主义建设，我干煤矿是内行，我应该发挥这一技之长。

就这样，他们同意我仍然回矿当工人。到小西天煤矿，见了很多老朋友，这里一切都变了，下井有工作服，上井有澡塘，下一班八小时，工作时间比过去减少三分之一。

不久，我和张桃荣结了婚，生了两个小孩，现在都已经十来岁了。

鹤壁建矿的时候，我从小西天被调到鹤壁陈家庄煤矿。我的眼睛因为在山西大同下圈窑遗留下不少病症，看不清东西，头脑还发胀，领导上很关心我，把我送到邯郸眼科医院治疗，用了几个月的时间，把眼睛治好了。



现在我是六级 这是王春明家祖传四辈的破油灯和烂毡帽

工，一家四口人，生活过得很好。飲水思源，要不是共产党、毛主席，我哪有今天呀！

我祖传的那个破油灯和烂毡帽，一直保留到现在。我不但给青年工人们讲，还给我的两个孩子讲，让我们的后代，记住好日子来得不容易啊！

（张励中整理 端 倪插图）

五十年來恩仇記

焦作礦山機械廠工人 柴忠學

孩子們最愛說自己的理想。我今年五十九歲了，年輕時也有過“理想”。那就是：置上十畝地，憑着一家人的辛勤勞動，能夠過着溫飽的生活。就為了這個可憐的“理想”，在舊社會，我沒日沒夜地整整幹了三十五年，最後仍落得一場空。

為了“理想”

要說我“理想”的產生，得從血淚的童年談起。

我家住孟津縣，祖宗三代都是要飯。我小的時候，娘總是背着我要飯。記得我六歲那年，一天夜里下了大雪，天明，雪積有尺把深。出門要飯吧，天太冷，怕凍死；不去要吧，肚子餓得咕咕叫，怕餓死。萬般無奈，娘還是背我出去

要飯了。一路上冻得我渾身打战，上下牙噤噤地乱响，我紧紧地搂着娘的脖子，胸脯紧貼着娘的脊梁，娘身上的热气，暖着我的心，可是背上冻得却像冰一样凉。下雪天，平地就够难走了，碰上陡坡，走起来更困难。在上一个陡坡时，娘艰难地一步步往上挪，眼看就到頂上了，一脚沒踏稳，骨骨碌碌又滚下来了，把我摔有丈把远。跌跌爬爬好不容易挪到村里，看到一个高門楼，心想要点飯吃吧，誰知“大爷”“大娘”刚叫出口，門里忽地窜出一条狼狗，张着血瓢大口，朝我扑来。娘刚刚举起打狗棍，就見門里走出一个人，穿着长袍短褂，围着大围巾，冷笑着說：“不认人也看看我的招牌，誰敢打我的狗！”娘哀求說：“孩子一天多沒吃东西，天这样冷，可怜可怜我們吧！”那人瞪了我一眼，惡狠狠地說：“你爷要飯，你爹要飯，你他媽的还要飯，誰能养活起你們这些穷光蛋，赶快給我滚！”娘看看沒有指望便拉着我走了。我想，什么时候才能吃碗飽飯，不受富人的欺侮呢！

爹年老了，在黄河上帮人家撑船，仅能顧住自己的嘴，家里人仍旧天天要飯。一九一三年，我才八岁，爹叫我也到船上混碗飯吃。上了船，我虽身小力薄，也得干很多杂活，大人洗船我舀水，大人做飯我烧火，大人吃完飯，我就赶忙刷鍋洗碗。九岁那年冬天，有一次，我往河里舀水做飯，河面结了冰，我把冰砸了个窟窿，胳膊短，趴下舀水时，脚一滑，一头栽进了冰窟窿。我使劲往上頂了几次，厚厚的冰怎么也頂不穿，后来順着船底摸了一陣，才扒住船帮。这时爹赶来了，把我捞了上来。在船上干了几年，学会了看风向、看水势，也会掌舵了。誰知穷人的灾难不是打一处来的呀！

一年冬天，船往巩县运煤，正走着，河上突然起了狂风，大浪嘩嘩地直朝小船打来，船像树叶一样，被大浪涌起来，又猛地甩下去。爹看我把不住舵了，就过来帮忙。这时，一个大浪嘩嘩地一声，把爹打进了黄河里。爹是一家人的命啊，沒有他，全家人就沒了指望。高高的浪头，夹杂着大冰块，不断冲击着他，眼看他老人家离船越去越远，我也不顾一切地跳进了河里。随风逐浪，一直追了五六里，河水才把我们父子二人冲到了浅滩上。冰块把我们撞得血肉模糊，渾身上下成了个血人，爹已经冻硬了。大伙赶来，把我们抬到船上，暖了半天，才缓过气来。就这样，死里求生，才仅仅能填饱自己的肚子，家里老老小小，仍旧是啼饥号寒。看看“理想”无法实现，我一气离开了船家，另谋生路走了。

在那年头，大小道路千万条，哪有穷人走的路呢？

到我十三岁那年，生活实在没办法，爹托人说合，把我送到陕西一家铁匠铺去当学徒。旧社会有句俗话：“徒弟，徒弟，三年奴隶，牛马不如，挨打受气。”真一点不假。当学徒本来想学点技术，可在那个“教会徒弟就要饿死师傅”的旧社会里，要想学点技术，真比上天还难。在铁匠铺里，我整天碾米、做饭、刷锅、洗碗、抱孩子、提便壶，根本沾不到学技术的边。每天天不亮起床，劳累一天，只叫喝两顿稀汤。眼看两年过去了，技术没学到，人也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了。

我十五岁那年，意外的祸事来了。掌柜为了多赚钱，私自做枪卖。被反动政府发觉后，来铺里抓人，掌柜跑了，那些豺狼不分清红皂白，就把我抓去当了兵。

“理想”的破灭

在国民党军队里，他们知道我学过铁匠，又把我分到兵工厂当学徒，历尽了千辛万苦，自己偷偷地看、偷偷地学，才算是学会了做枪。这时我想，要是攒几个钱，能买十亩地，回家下力耕种，让一家人吃饱肚子，那就好了。

我抱着这个“理想”，在兵工厂里干活，开始他们说按件给钱，每件给三块现洋。我想两天做一件，一个月四十多块也不错。谁知整整干了半年，他们连一个子儿也没给。第一次向工头要钱时，他皮笑肉不笑地说：“先好好干吧，钱到手就给。”我信以为真。谁知等了个把月，仍不见动静。第二次又向他要钱时，他不耐烦地说：“挣仨核桃俩枣成天要，钱来了还能亏待你们。”又等了一二十天，还是不见给钱。第三次我们要钱，和工头吵了起来，厂长看赖不过去，每人给了一块钱。没停几天，工头跑了，把我们的钱全都驱走了。以后我又到几家工厂里干活，家家如此，能吃饱肚子就是好事。钱一个没落住，“理想”变成了幻想。

十几年过去了，十亩地仍然连个影子也没有。一九三九年，家乡正闹大灾荒。要饭的人遍地皆是，啥也要不来，两个大孩子被活活饿死，老三、老四也是奄奄一息，眼看全家人都完了。我和孩他娘商量，决定到陕西逃荒。临出门，全家大小四口人带了五个糠饅和六角钱。走进洛阳车站，到处都是难民。孩他娘带孩子去要饭。饭铺里一个人吃饭，一圈围五六个人伸手要，啥也要不来。搭车走吧，又没有钱。我想，一家人不能困死在这里呀！狠了狠心抓住一家人仅有的

一条破被子要卖，孩他娘哭喊着说：“眼看天快冷了，这一条破被子卖了，人还不得冻死！”我说：“不卖，就得困死在这里，走一步说一步吧！”一条被子换来的车票，只能搭到观音堂，再没东西可卖了，只好步行往前走。一路上饿死的难民成千上万，野狗成群结队，到处啃着死人的尸体。走到愁肠湾，那真是个人穷愁断肝肠的地方，一片荒山野岭，连个人烟也没有。这时，我们已经两天没吃东西，大人孩子都走不动了。孩他娘用三块石头支起了锅，拾了一把野草，把沿途讨来的一点黑面滚了三碗稀汤。给小三盛了一碗，俺俩也都盛了一碗。两岁的小四饿得只是干嚎，实在没办法，就把要来的糠窝窝给了他一块。小三看见馍也要吃。我哄着说：

“好孩子，你大了，弟弟小叫他吃馍，咱都喝汤。”其实小三也是才会跑路的啊！我话刚一落音，孩子就哭着说：“我还得跑路，弟弟吃大的给我一块小的吧，爹！我饿！”孩子这么一说，他娘的眼泪扑扑达达掉在了碗里，搂着两个孩子哭了起来。我看孩子的小腿都跑肿了，浑身瘦得皮包骨头，不由得也掉下了眼泪，把剩下的半碗稀汤，也给孩子倒在碗里。一家人哭着吃着，却不见小四动，仔细一瞧，快断气了。我们边哭边叫，越叫越不行，就这样，眼睁睁的看着一个孩子活活饿死了。

尽管生活对我是这样残酷，但我还是不死心，我想那怕干上十年、二十年，甚至一辈子，也要置点地，不能叫子子孙孙再受财主家的气。我想尽办法到各处找活做。

有年冬天，我在閻錫山的兵工厂里干活，好像希望真的来了。开始每月还能落个十几元，我想积少成多，干上几年，地就会到手。我在厂里真是受尽了欺侮，但是为了攒钱，我

都忍了。有一次，我在地上拾了一根四五尺长的绳子当腰带，門崗硬說我偷厂里东西，罰我和一个姓李的伙帶一副脚鐐，做了三天土工。我想，現在我受你的欺侮，那是因为我穷，等我有了地，誰的气我也不受。我忍辱偷生还是干。冬天，风雪交加，寒气逼人，我連棉衣也舍不得做，一切为了攢錢，每月剩多剩少，都要寄到家里。后来厂里越吃越坏，光叫吃黑豆面，不少人都病了，工厂不仅不給治，还打着叫干活，很多人硬叫拖死了。不久我也病了，看看再干下去，命也保不住了，我向厂长要求回家治病，說了半天，他还是冷冷地說：“沒那么便宜，想走就走，想来就来！該井里死河里淹不死，只要有命就死不了。”以后我大便拉血，一拉就是一大摊，連路也走不成了。这时，厂长就叫人把我的床抬到工房里，說：“不能站着干，躺着也得給我干。”过了些时，眼看渾身上下只剩了一把骨头，說話也很困难了，厂长怕我很快就要断气，一文錢不給，一脚把我踢了出来。

离老家几百里地，連个盘費也沒有，穷哥們看我可怜，大伙給湊了一斗多粮食錢。我挪几步歇一歇，走走爬爬，要点飯吃吃，心想家里也許生活好了，我先前省吃俭用，往家捐的錢該买成地了吧！千辛万苦到了家里，誰知家里比以前更穷了，破房子塌了，八分老坟地也卖了。母亲說我捐的錢一个沒收到，后来才知道都是保长半路截走了。这些吃人的野兽，真是丧尽了天良。我家里人活活餓死，他們还来搶我拿命换来的錢，我真想咬他們几口。可是在那暗无天日的社会里，哪有穷人說理的地方啊！

要拼出一条血路来

討飯吃，地主罵你是穷光蛋；凭力气換飯吃，資本家恨不得把你的骨头敲碎，吸出骨髓来。更何况还有那些保长、甲长、大大小小的地头蛇。我想，只要这些喝人血的家伙存在，就不会有好日子过。我要和他們拼了！

家里沒了房，全家人都住在破祠堂里，我有病，孩他娘領着孩子在外边要飯，她忍饥挨餓，总是把要来的东西，給我留下。一天，我正在屋里躺着，忽听得院里有脚步声，我歪头一看，原来是大地主的儿子李更闖进来了。他一进屋，不由分說，到处乱翻，破破烂烂的东西，扔得到处都是，嘴里还不干不淨地罵着，硬說我偷了他的东西。我真是惱火极了，这簡直逼得不叫人活！我攢攢劲站起来，走到李更面前，乘他不防，一巴掌打在他的脸上，一下打掉他三个狗



牙，他搗着血嘴嗷嗷叫着往外跑，我又追了出去。他的狗腿子威胁我說：“再往前走开枪啦！”我拍拍胸膛說：“照老子这

里来！老子和你们拼了，有种的开枪吧！”众乡亲听到吵嚷声，都涌出来了，很多人替我抱不平。有人说：“老柴是杉木杆子，只折不弯，他从来没偷过别人东西。”也有人說：

“这明明是欺侮人么，哪还有穷人过的日子！”李更和他的狗腿子們，看看討不了便宜，一个个夹着尾巴溜了。

这些家伙就是欺軟怕硬，你要軟，他光欺侮你，你要硬，他就把尾巴夹起来了。一次，駐在我们那里的一个国民党排长，叫我修枪，我不干，俩人吵了一架，他临走說：

“他媽的，老子回头和你算賬！”夜里，我正在睡覺，忽听得砰砰有人敲門，我还没跳下床，門就被撞开了，那个排长气势汹汹地瞪着我說：“走吧！”看看逃不脫，我就頂着他說：“走就走，你还能把老子吃了！”走到沟边，我一个箭步上去，伸手把他按倒在一块石头上，上边拳打，下边脚踢，狠狠揍了起来。紧接着，又一脚把他从丈把高的石头上踢了下去。

拼来拼去，因为没有找到正确的道路，仍然沒有拼出名堂。

我为了养活一家人，从八岁开始，到解放前夕，整整苦干了三十五年，背駝了，腰弯了，光嘴巴上长出了胡子，头上添了白发，最后落的是：房塌了，老坟地卖了，爹死了連埋的地方都沒有！我的七个孩子，餓死、病死了六个。这就是我抱着可怜的“理想”，奋斗三十多年的結果。

党给了我新生

一九四八年，解放的炮声响了，这炮声是我終生难忘

的。在絕望中它給我帶來了新的希望，也給我奄奄一息的家庭帶來了新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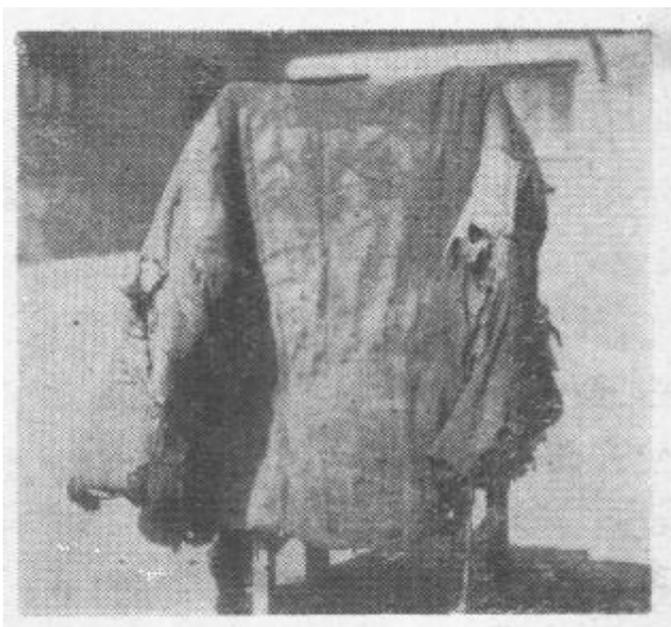
解放前夕，我的三个孩子都先后出麻疹，因沒錢医治，两个小的都死了。三孩喜方正发高烧昏迷不醒。医生嫌我家沒錢，連門都不进。街坊邻居一个比一个穷，誰也救不了誰。孩子病得越来越严重，眼看这最后一个孩子也保不住了。正在我們哭得死去活来的时候，解放了！党派来的女工作員进了我的家，她立刻叫来了医生。医生仍然推推拖拖不想看，她說：“你是怕不給錢吧？該用啥药你情用了，錢不管多少我包了。他的七个孩子就剩这一个了，一定要把孩子救活。”医生打了針，工作員还不放心，一直幫我們守着孩子，又是送吃的又是烧水，整整守了一夜，孩子好轉后，安稳地睡了，她才肯离开。我奔波了大半生，受尽了人間苦，想不到天底下还有这样的好人。后来，我特地找她道謝，我說：“你真是我一家的救命恩人呀！”她笑着說：“这都是共产党和毛主席給的，咱的救命恩人是毛主席！”

旧社会我抱着个可怜的“理想”，苦熬苦干，落的是家破人亡。新社会我当了国家主人，生活有了保障，就在我什么也不敢想的时候，幸福却偏偏来到了我家里。喜方高小毕业后，和我一样当了工人。四十多岁了，我又添一个闺女一个儿子，現在女儿上了中学，小儿子也上了小学。三代要飯的人，家里也有了念书声。一九五五年，我参加了党，成了光荣的共产党員。毛主席、共产党啊！沒有您，怕我老柴的骨头早溷成灰了。

我总想多干点活，干的少了渾身不痛快。一九五二年手工套螺絲，定額一百个，我干到三百个。一九五六年上水車

鏈子皮錢，那時的定額是三百五十個，我干到一千個以上。一九六二年做鐵鍬，我月月都完成計劃的百分之一百五十左右。十三年來，我沒曠過工。有一次，背上長個大疙瘩，像饅頭一樣大，四下流膿，別人勸我休息治療，我沒休息。去年，裝水車，拉杆頭把腳又砸腫了，同志們又勸我休息，我抹點藥又癩着上班了。我想：快六十歲的人了，不抓緊干上幾年，就沒時間了。

從“理想”的產生，“理想”的破滅，到獲得新生，這就是我一生走過的道路。在這條路上，有血、有淚、也有歡笑。這一切我都牢牢地記在心裡。我母親親手交給我的一件破棉袄，現在我還保存着，將來還要傳給我的子孫，讓他們永遠記着過去，也只有記着過去，才能更加熱愛今天的幸福生活。



這是柴忠學的母親要飯時穿的破棉袄

(中共焦作市委辦公室整理 吳懋祥插圖)
中共焦作礦山機械廠委員會辦公室

十三条人命的血泪仇

洛阳轴承厂工人 楊发祿

我叫楊发祿，今年已經四十五岁了，現在洛阳轴承厂鍛工車間当搬运工。今天，我要控訴那吃人的旧社会，控訴万恶的地主阶级。控訴他們无人性地拆毀了三个家庭。杀害了我家、我姥姥家以及我姐夫家共十三口人，逼得我在外流浪了十五年。想起旧社会，地主阶级的这些鮮血淋漓的罪状，想起我家的悲惨遭遇，我的心里，充滿了对旧社会，对地主阶级的憤怒和仇恨。

三 笔 血 債

我老家在河南省滑县宋林。在国民党反动派統治时期，我家十三口人，只有三間不避风雨的破草棚，一亩七分老坟沙荒地，一条盖了三代的破被子。祖祖輩輩給地主作牛作

馬，从沒吃过一口干飯，从沒穿过一件新衣。整年过着“早上湯，晌午糠，晚上对碗看月亮”的穷困生活。

我父亲叫楊新河，給恶霸地主宋老成干了一輩子长工，到了年老体弱的时候，地主看他再也榨不出什么油水了，就把我父亲一脚踢了出来。我父亲是个硬汉子，他回到家里，領着我們全家，天天吃糠咽菜，在那一亩七分沙荒地上，起五更，搭黄昏，苦心經營，希望熬出个头来。

那时候，我的几个哥哥已长大成人了。父母亲也打算着給他們娶个媳妇。在我两岁那年，好心的邻居給二哥說了个媒。我們穷人家怎能娶起亲呢！父亲和母亲再三商量后，硬着头皮向地主宋老成借了十五串錢，才算把二嫂接回家。誰知道，在那暗无天日的旧社会里，借宋老成这十五串錢却惹下了家破人亡的滔天大祸。

宋老成不但是个大地主、大恶霸，而且还与大土匪王三祝暗地勾結。他們私設牢房，另立法令，打家劫舍，奸淫烧杀，无恶不作。在滑县有一句話：“宋家校場，打死人不偿命。”宋老成的儿子宋太长，孙子惠魯、方魯，就凭借这种反动势力，橫行霸道。我們庄上三条街，宋家就独占了一条前街，又强把庄名改为“宋林”。“宋林”就成了宋家的黑天下。

当时宋老成借給我們錢，就沒安好心。我大哥、二哥、三哥，身强力壮，都是种庄稼的好把式。宋老成把我父亲撵走以后，早就想从我三个哥哥身上榨油。現在父亲去借錢，这真是他求之不得的好机会，宋老成便一口答应了，并还要我父亲立了个文书。其实，立不立文书都一样，那时根本沒有穷人讲理的地方。

我父亲借賬时文书上写得明明白白，讲明一年半为期，



本利还清。但是头年八月借，过年麦季就来要账了。那一年，我家十三口人，辛辛苦苦才弄到一石五斗麦子。宋老成知道以后，带着狗腿子上门来了。一进门就对我父亲说：“新河，今年收成不错呀，你的账也该清了。”父亲迎上去说：“大爷，文书上不是写的一年半的期吗？到期一定送过去……”宋老成把眼一翻说：“什么到期不到期，叫你还就得还！”

他两眼死盯住我们那一堆麦，把手一指：“先交这个，剩下的秋后还清！”父亲气得说不出话来，母亲只好忍气吞声，双膝跪下苦苦哀求：“宋大爷，你行行好啊……”宋老成一脚把母亲踢倒在地，大哥、二哥气火了，上前就想打。父亲这时才喘过一口气来，知道宋家不是好惹的，把大哥、二哥拦住。他们就连打带抢地把麦子扛走了。

我们一家的口粮被抢走以后，逼得父亲走投无路，一气之下，上吊死了。

父亲死后，母亲领着我们四处讨饭过活。可怜我的五哥身得重病，又没有吃的，没过冬天，就活活的饿死了。

后来，宋老成又在我大哥身上打鬼主意。他派人对我母亲



說：“新河一時想不開死去了，很可惜。其實，宋大爺是最講信用的，有借有還，再借不難，你們還清了賬，日子過不去還可以再借嘛。現在人死了也不能哭活，還是安排安排今后的日子吧。宋大爺知道你們有困難，他老人家又很喜歡你家玉山。宋大爺的意思是，想叫玉山跟大少爺到東北做生意，只要他好好幹，將來大有好處。”這真是黃鼠狼給雞拜年，沒安好心。誰不知他們的大少爺是東北的“鹽灘司令”，穿着國民黨的校級軍官衣服，用從老百姓身上搜刮來的血汗錢，在東北做鹽田買賣。被他騙出去的人，連一個也難回來。母親不讓大哥去為他們賣命，央求說：“大爺的‘好意’我們心里都明白，只是玉山不懂事，不會服侍大少爺，還是留在家裡種地吧。”這家伙眼看詭計被識破了，就凶狠地說：“我們把話說明白吧，不聽大爺的話可以，不還大爺的賬可不行。你要放明白點，上次那一石五斗麥，還不夠利錢呢！舊賬加利錢，限三天內還清！”

從此以後，宋家一天三次來逼債。我們那時連嘴都顧不住，哪有錢去還他那吃人的無底賬呢？但是，“肉在虎口，勢在人手”，那有什麼辦法！到了第三天，大哥為了一家人的活命，便忍痛離開了我們，到東北給宋家扛長工去了。大哥在那裡扛了一年半長工，只落了一塊銀元的工錢。大哥再也忍不下去了，要飯逃到新乡，以後便流落在新乡了。

我大哥逃走後，宋老成硬逼我家要人，一定要我二哥或三哥去頂替。二哥三哥被逼得沒法，只得離家到外面躲避起來。宋老成一見我家三個大兄弟都不在，只剩些婦女、小孩，就用種種無恥的手段，把我二嫂逼得跳坑自殺了。

二嫂死後，留下兩個女孩和一個十個多月的男孩。二哥



无力撫
養，把兩
個女孩送
人當童養
媳，男孩
給人作養
子。二哥
因生離死
別，冤冤

屈屈，氣成了瞎子，不久也死去了。

當時，我們家鄉一帶，革命和反革命的鬥爭很激烈。經常處於拉鋸形勢。我三哥和鄉親們眼看親人一個一個被逼死，心如刀攪。我三哥就和七八個青年農民，一起投奔了八路軍。八路軍來了，貧苦農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，團結起來，推選我三哥當農會主席，鬥爭地主，鬥爭宋老成，實行減租減息，進行土地改革。以後，八路軍轉移了，他們就留下來，堅持游擊鬥爭。但是，由於叛徒告密，三哥不幸被宋家還鄉團抓住，關進滑縣城大土匪王三祝的牢房。三哥被關在黑牢里，不給吃不給喝，還綁起雙手，逼他供出地下組織名單。但是，三哥總是那句話：“叫我咋死都成，就是不知道！”敵人沒有辦法，又怕八路軍回來，關了三天，就把三哥活埋了。同三哥一起被活埋的還有二十一個階級弟兄。

三哥和二十一個階級弟兄雖然光榮犧牲了，但是，他們那種英勇不屈的革命精神，卻鼓舞了莊上受壓迫受剝削的勞苦群眾，他們在地下黨的領導下，團結得跟一個人一樣，進行着更加艱苦的鬥爭。宋老成害怕革命的群眾，害怕我家

还有兄弟报仇，于是，就想把我家斩草除根，要我家灭門絕后。

这时候，我家只剩下四哥、母亲和姐姐在家里。宋家地主还乡团便把四哥抓去填了壮丁。从那时起，我们就没见过他，直到现在还不知他的下落。四哥被抓走后，宋太长又向我母亲派捐要税，硬把她老人家逼得到新乡要饭了。由于精神上的极度悲愤，我母亲到新乡已经气成了疯子，以后在一次日本鬼子的飞机轰炸中，被压死在瓦砾堆中。

我姐姐小名叫彭妞，因为家穷养不起，十五岁就出嫁了。她丈夫姓刘，在道口宰羊杀鸡。后来姐姐生个小外甥，一家三口人，日子也很苦，由于生活顾不住，他们就一起到我来了。他们一进村，宋太长就拦着他们说：“你们这些共产党的狗腿子，快给我滚出村去，滚！”我姐姐说：“我回的是娘家，你管不着！”宋太长一听跳老高，咆哮着说：“啊，我管不着，宋林是我宋家天下，在这儿就得听我的。你想死，就呆在这里；要活，就赶快滚！”那时，我姐姐已怀孕六七个月了，行动起来非常不便。过了几天，宋太长竟派狗腿子连打带撵，把我姐夫一家——姐夫、姐姐和外甥，赶了出来。他们沿途求乞，走到浚县，姐姐快要分娩了，便住到一个破庙里。一天，姐夫和外甥分头出去要饭给姐姐吃。姐夫从早到晚，走了一村又一村，要到一勺半碗舍不得吃，自己就饿死在路上。姐姐和外甥在庙里等了三天还不見姐夫回来，姐姐就拖着沉重的身子出来找他，没走多远，在一个桥底下就临产了。在那荒郊野外大桥下，叫天天不应，叫地地不灵，身边又是个不懂事的孩子，我姐姐晕死过去了。等她醒来以后，才自己动手收拾婴儿。可怜新生的

这个小外甥，生下来就没穿没吃的，用破席片包着，到第七天就送给人家了。为了活下去，姐姐以后也改嫁了。我姐夫这一家，就这样被宋太长害得生离死别，家破人亡。

可是地主宋老成还不罢休，接着就在与我家仅隔三个门的我姥姥家下了毒手。

我二舅、表舅、表哥三人，因为参加过贫农团，斗过地主，因此，宋家还乡团一回来就把他们抓走枪杀了。

我二舅他们被害后，地主宋太长和他的两个小子，又强把我二舅的儿媳、两个闺女，和舅母卖给人家当小老婆。后来，二舅母气死了，二舅的大闺女在生小孩时也病死了。

这就是大恶霸地主宋老成、宋太长欠下我们三家的血债！

流浪生活十五年

在这场大灾大难中，我虽然侥幸逃出，但宋老成一家还是把我逼得在外流浪了十五年。这十五年我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！说起来真是一言难尽。

我二哥屈死后，三哥就去找八路军了。那时我才十四岁，宋老成又逼我当长工，说是顶父亲的眼。母亲明知那是个虎口，进去出不来，十分伤心。我自己也清楚，宋老成一家就没安好心。便央求母亲说：“在家要饿死，到宋家也是死，不如让我逃出去吧！宋老成欠下的血债，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，我一定要报仇！”母亲抱着我，哭了大半天后才对我说：“儿啊！咱与宋家势不两立，你一定要争一口气，别忘了给全家报仇……儿呀！你要保重……”

那时已经是腊月天了。等到夜里，我只穿一件破得没有袖的棉衣，一条包不住屁股的单裤子，光着双脚就要往外走。当我刚跨出门口，母亲又把我叫了回去，她脱下了自己身上的一件破褂子，披到我身上。衣服虽旧，但从母亲身上传来的温暖，却把刺骨的寒风挡了开去。我感到非常暖和。哪里知道，从此母亲就和我永别了。

在那黑暗的年月，茫茫大路，我上哪里去呢！我决定先上道口镇姐姐家。但是到了姐姐家，姐夫已经失了业，锅盖早已揭不开了。所有这些，我都看在眼里，想在心里，趁姐姐出去的时候，我便偷偷地走了。

不知道走了多少天，要饭到了新乡，找到了大哥。大哥见我大雪天还光着双脚，便出去拣了两只没有底子的鞋，回来收拾一下给我穿。那时，大哥是靠拣破烂混饭吃的。我看跟着大哥也不成，就含着热泪，穿着大哥给我收拾的破鞋子，说去玩玩，瞒着大哥又走了。

我溜到火车站，扒上火车就到了许昌。到了许昌，同样没吃没住。后来，我又不知走了多少天，经过襄县到了禹县，这时候已经是腊月二十几了。过了春节，听说风雪寺有会，就到那里讨吃的去了。会散以后，便留在一个大庙上，给庙里做些零活，要点饭吃。我看这里还有两餐饭吃，就去我老方丈要求出家。但是，老方丈了解了我的身世以后，就不敢收了，竟胡说什么是因果报应，其实是他怕受牵连。以后就把我送到庙里的佃户高大爷家，同他一起给庙里当长工。

但是，天下乌鸦一般黑，我在高大爷家给庙里放了两年羊，种了两年地，等到我十八岁那年，老方丈就把我当作壮

丁卖给了联保处。后来被押送到洛阳李家楼的所谓新兵集中营。在那里，一个小黑洞里关了二百多人，一个挨一个坐着，每天放风一次，大小便都有人跟着，夜里睡觉是一个挨一个地用绳子拴起来，吃的是一天两个麸皮馍，一勺白菜汤。很多阶级弟兄，就这样被活活地折磨死了。这真是人间“地狱”啊！

有一次，跑了两个人，被抓了回来，当官的就把大家押出来“训话”。一个当官的说：“谁想跑，就像他们两个一样！”说完以后，一个被砍了一只手，一个被挖了一只眼，并对他们说：“如果还偷跑，下次再砍那只手，挖那只眼，看你们还敢不敢造反！”

这些“活阎王”以为这样大家就怕了。事实相反，大家被逼得没办法，跑的人越来越多。反正在这里也是死，不如想办法逃出这个魔窟。和我一起拴着的十二个弟兄，大家商量好以后，就在一天夜里从窗口爬出去跑了。我逃出来以后，便流落到郑州。心想这回可以挣扎着活下去了，夜里我在一家浴池烧水炉口睡觉，白天出去要饭。后来，我就依靠挑煤土、上火车卖茶水过活。那时候，跑火车卖茶水是个卖命活。首先，每隔三天，就得向伪警老爷们送钱送吃的，否则，你就别想再去卖茶水。有一次，我的一位同伴，因为孝敬伪警迟了点，一上火车就被伪警抓住了，踢了茶壶，打了一顿，最后被推下火车，险些丧了命。

做这种买卖，还得老早就在火车站外等着，待火车开过来时，一手扒着车门，一手提着茶壶，飞车上去；快到终点站，又要在车未进站时，飞车下来。有很多人，为了一天喝两碗稀汤，结果就在这一上一下的飞车中送了命。

卖煤土，跑火車，加上要飯，还是吃不上一頓飽飯。

我又卖掉茶壺去租架子車來拉。拉車又得先敬把頭三個月，這叫做“入門禮”。這三個月拉多少都得送給把頭，到第四個月，拉的錢才能分一半。把頭、車主壓在頭上，我仍是啞巴吃黃連，苦在肚里！

在舊社會，我們勞苦群眾，不但吃不飽穿不暖，而且到處受地主、資本家和國民黨反動派的欺壓。這些傢伙把勞動人民統統叫做“下等人”，把拉車的叫作“下等苦力”。那時候，我認識了一位姓吳的朋友，也是拉車的，這位朋友見我無處安身，就給我找了一個破洞子，叫我搬進去住。但是住進去不到三四天，偽保長就來攆了，偽保長說我不是“良民”，叫我趕快“滾蛋”！沒有辦法，只得搬走。以後，一到冬天我只得還去蹲浴池的那個火爐口；夏天，就睡在馬路上，遇風雨天，就更不好過了。

當時，我經常想：這麼大的一個中國，為什麼連我一個楊發祿也容不下呢？

永遠跟党走

黑夜終於過去，一九四八年鄭州解放了！

鄭州解放那一天晚上，我正好睡在鄭州火車站北站口。我這個受盡舊社會壓迫的窮苦人，終於在北站口站了起來，參加了鄭州市人民最先迎接解放軍、迎接解放、迎接光明的行列。

鄭州解放了！全市人民歡喜若狂地慶祝自己成了新社會的主人，大街上，胡同里，到處是歡笑聲，爆竹聲，鑼鼓

声，和一队队扭秧歌的人群。

共产党，毛主席给我们劳动人民带来了光明，我也从此获得了新生。解放军一进城就召开了群众大会，在这个会上，我和大家一起，第一次听到了“团结起来，巩固后方，支援解放军，解放全中国”的号召。也是在这个会上，我领到了一套新棉衣、一条被子、一条裤子。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棉衣、被子和裤子。以后，又第一次有了住所，第一次领到工资，第一次参加讨论会发表自己的意见……

解放以后，我们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，获得了生活、工作、学习、当家作主的权利，但是，我没有忘记，那时全中国还没有彻底解放，还有很多很多阶级弟兄生活在苦难中。我志愿参加了支援解放南京的担架队。南京解放以后，我又回到郑州，不久我就参加了板桥水库的建设，在工地当搬运工人。

但是，正当我投身建设祖国的时候，旧病复发，害了眼，两步以外的东西看不见了。党和政府立即把我送到郑州市人民医院医治。在组织上的关怀和医务人员的精心治疗下，住了三个多月，病愈出院，重见了光明。

从医院出来，领导上为了照顾我的健康，分配给我一个较轻的工作，把我调到驻马店粮食公司去管仓库。在那里，我半工作半休息了三年多。直到一九五三年，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面开始以后，我再也呆不住了。我要求参加这个伟大的建设行列，我要求继续去当搬运工人，贡献自己的力量。一九五六年我被调到洛阳市来支援重点建设。

党不仅救了我，还救了我大哥和姐姐，使我们重新团圆了。

我从十四岁被地主撵出来起，就和大哥、姐姐失去联系，互相都不知死活了。一九五八年，在组织上的关怀和帮助下，我终于找到了他们。想不到，我们分别二十六年后，在共产党、毛主席的领导下，又团圆了。解放以后，党和人民政府给我们家、姥姥家和姐夫家都报了仇，申了冤，地主宋老成依法惩办了，并且给我三哥等重新安葬，立了碑，大侄子也回家了，两个侄女也找到了。

在旧社会，地主宋老成，曾用尽一切毒手，要把我家灭门绝后；可是，在新社会，在共产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我们一家人不但重新团聚，而且个个生活美满幸福。现在我大哥还在新乡市，他的三个儿子，分别在建筑公司、铁工厂、纺织厂当工人。一家三代二十口人，过着欢乐的生活。一九四九年我姐姐就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现在浚县，全家五口都是好社员。儿子和媳妇也是共产党员。那个在桥底下出生的外甥也回家团圆了。二哥的两个女儿，从小给人家当童养媳，受尽了旧社会的封建迫害以后，也找了回来。我在一九五六年也成了家。每当我想起过去，又看看今天侄子和侄孙们幸福地成长的时候，我心里总是十分激动。我决不会忘记过去，我也决不会忘记共产党、毛主席对我一家的救命之恩。我一定要好好学习，努力工作，坚决听毛主席的话，永远永远地跟着党走。

（周光瑚整理 山思发插图）

痛忆惨死的八个儿女

郑州国棉三厂女工 刘小妹

我家住在苏北盐城县丁馬鎮，祖祖輩輩都是扛长工。一九一七年苏北遭大水，庄稼不收，全家生活沒有办法。爹把瓮底扫光，給地主楊家交了租子。楊家还說沒清賬，下欠他五斗多粮食。那年正月初一，家家户户放鞭炮，过新年，楊家带着一群狗腿子，如狼似虎地闖到俺家来逼租。他一脚踢开門，二话不說，先提走鍋，接着又把一家大小撵了出来。一家人走投无路，爹想，上海地面大，杂活多，能找个活，糊住口，就餓死不了。爹媽領着我姐妹兄弟四个，河里洗脸庙里睡，討着飯去上海了。誰知到了上海，看到那里的穷人日子更难过，沿着黄浦江的高昌庙一带，到处都是受饥挨餓的逃荒人。我們一家无处安身，就到了“万人坑”石灰窑，用破竹竿、烂席片支撑起个只能容身的小棚子，六口人挤在一起，这就算是我們的“家”了。“打不尽毡上土，訴不

完穷人苦”，到外边扛活的爹爹和拉着弟弟讨饭的妈妈，总是清早空手走，晚上空手回，把我和两个守家的姐妹，饿得皮包骨头哭不出声。在这度日如年的日子里，爹认识了个卖菜的王阿叔，才算穷都穷弄了个卖菜的本钱。日子还是难过，经常吃上顿没下顿，爹妈想把我送进纱厂去做工，但是，又没有钱给考工送礼。左思右想，爹只有狠狠心把卖菜的本钱拿出来，又东拼西凑借了些钱，给人磕头作揖，立下个“养成工”的字据，我才算进了日本人开的内外棉三厂。那年我才十二岁。

我进厂后，一天干十二个小时的活，从脚尖进厂门，就脚手不停的落纱。刚想直直腰，棍子就落到头上，要是弄坏一根线，脊背上就得添上一道血痕。落纱赶的人连解手的空都没有，有一次我在落纱时到厕所解了个小手，工头知道后，便用胳膊粗的毛棍，向我没头没脑地打起来。我刚想抬手摸一摸头，手脖上就是一下，还没哭出声，脸上就是一巴掌，我疼的实在忍不住了，泪滴在纱管上，工头就扣了我三天工钱。从此，落纱时，那怕尿到裤里，我也不敢再去厕所解手了。

我像一棵生在苦水沟里的小树，尽管受尽了折磨，可还是一年年地长大了。我二十四岁那年，就和在碗店里打杂的刘庆桐结了婚。结婚后，我曾经十次怀孕，但是在那吃人的旧社会，只养活了两个，其中还有一个是残废。现在我要讲的就是我那八个儿女是怎样惨死的。

头生儿未见爹娘

“走进纺织厂，见了活阎王”，这是对旧社会纺织工厂

的真實描繪。我懷第一個孩子的时候，邻近的小姐妹們告訴我：怀孕了就要被开除。这点我何尝不清楚，进厂时工头說过：“进厂不准养儿，誰养誰就早点滾。”可是既然結了婚，还能不养儿？我想：只要你一天不吭气，我就干上一天，啥时候你說話了，我再走也不迟。我怀孕六七个月了，监工的也沒有动静，我觉得很奇怪，人心隔肚皮，誰知那些狗口的肚里装的啥貨？有一天，我正在落紗，只觉脊梁骨猛一疼，等我直起腰扭回头时，只見当班的监工正举着毛棍照我身上打，嘴里还罵着：“老子不让你生，你不听！”說着一毛棍落在我肚子上，一陣巨疼我暈倒了。等我醒来时，厂里的小姐妹已把我抬到家里。第一个孩子就这样被打死流产了。

孩子虽然死了，但为了不餓死，我小产后第三天又去厂里做工了。厂里規定：三天不送厂，一律开除。有什么办法呢？要活下去，就是刀山也要上呀！

躲炸彈 小棍儿天折

第二年我又怀孕了，为了不让抄身婆看見，我把肚子尽量勒紧，走路学駝背。可是胎儿一天天大起来，人又瘦得像麻秆，那怕你跪下爬着走，也难瞞过別人的眼睛。一天，我清早去上工，走到厂門口，一个抄身婆賊眼滴溜溜地瞅着我的肚子，似笑非笑地向我挤眼，意思是要我送礼給她。那时我們夫妻俩做死做活，連最粗的玉米面也吃不上，用什么送礼呢？就算送了礼，孩子生下后，按厂里規定，还不是照样被开除。于是我咬咬牙，装着什么也不知道，就硬着头皮进

去了。

恶狼找不到食吃就急了。隔了几天，我正在車間做活，抄身婆領了領班的日本人走过来。抄身婆上前就摸我的肚子，然后她賊眉賊眼地对領班的說：“报告大人先生，她肚子大大的。”

“嘿嘿，”日本鬼子領班干笑了一声說：“开除！馬上的开除！”接着又唧唧呱呱地說了些听不懂的話。抄身婆又向我装腔作势地說：“先生說，中国人太多，你們生，他們就死啦死啦的。”說着她还作了个杀的手势。

“呸！卖国賊。”我气得渾身发抖，“难道我等着挨你們杀嗎！我就是失业，也要把孩子生下来。”我把手中的紗管往地下一扔，連头也不扭就走出了厂。

我被开除后，紧跟上“七七”事变，蔣介石卖国投降，日本鬼子很快就打到了上海附近。日本飞机整天在头上盘旋投弹，有錢人躲到地下室里，穷人家沒处躲藏，只好在炮弹下东窜西跑。我的二儿子小棍儿生在这个年月里，算是黃連炮半夏，苦上加苦。有时候炸弹掉下来，就赶忙把他放到肚子下面，压得他沒气；有时候放进草窝里悶得他脸紫身青，躲了半个多月的飞机炸弹，小棍儿身上长了一个挨一个的毒水泡，那年月，飯还吃不上，哪有錢治病，不几天，孩子就活活地疼死了。

阿鉄討飯慘喪命

老三起名叫阿鉄，意思是让他像鉄一样硬硬棒棒地长起来。誰知，在那吃人的旧社会里，穷人是鉄也会一块块的被

人剝掉。

阿鉄长到五岁，个头长得挺高，也很懂事，他看到家里日子苦，就帮助爹爹媽媽拾煤核。每日三頓飯，喝的是稀湯，爹娘哪个不疼自己的孩子，我把稠的捞給他喝，他却很懂事的說：“爹媽要干活，我不吃。”有时他餓极了就瞞着爹媽去外边要飯。就是这样的苦日子，我們一家三口人也沒能安安生生地过下去，飞禍終于临头了。

一天，我刚到火車站拾煤核，一个小姐妹急急忙忙跑来对我說：“阿妹，不好了！你阿鉄快被恶棍打死了。”我一听，脑子嗡地一下就像要炸开似的，提上籃子就往家里跑。到家里一看，阿鉄鼻子嘴都出了血，小嘴一张一张地出气很困难，天啊！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是阿鉄去南市要飯，那里要飯的把头不准他要，赶他走，阿鉄不走，就被一群恶棍毒打起来。抬回家因沒錢治伤，第二天阿鉄就死了。我像塌了天一样，扑在小阿鉄身上哭得死去活来。庆桐气得去找南市的恶棍算賬，又被他們打了一頓。去警察局告状，警官說：“井水不犯河水，你們是石灰窑的，誰让他去南市要飯，打死活該。”这是什么理啊！小阿鉄就这样白白的死去了。

阿鉄死后，我的心要碎了，整天像疯子一样。

啼飢号寒 四儿餓死

生老四正赶上腊月天，天寒地冻，滴水成冰，孩子一落地就冻得哭不出声，我心里像刀剜似的。想起死在肚里的第一个孩子，想起小棍和阿鉄的慘死，眼泪像断綫珠一样地流

了下来。哭有什么用呢，眼泪又养不活孩子！为了能把孩子养大，我产后第十天就东奔西跑找活干。可是，誰愿意要我这副骨头架子呢？外面北风一个劲地吼叫，大雪越下越猛，整个世界混混沌沌，天和地都分不出来……

孩子在怀里冻得发抖，买不起煤烧，他爹就把屋里仅有的一张坏凳子劈了当柴烧，烧光了再抽床上的草烧，大人宁愿再冷些，也不愿意让孩子受冻。穷人还是穷人，能有多少东西当柴烧呢！不几天，家里能烧的东西全烧光了。大人没飯吃，小孩就没奶吃，老四就这样连冻带餓，沒有活多久就断了气。

鉄蹄摧残 五儿流产

一九四二年冬天，是日本侵占上海的第六个年头，我眼看就要生第五个孩子了。石灰窑突然被鬼子封鎖了。很快周围便拉下了鉄絲网，相隔五尺远就站着个鬼子，桥头上架着机枪。当时我真急坏了，庆桐被隔在封鎖线外边回不来，家里只有我一个怀孕的妇女，想到鬼子的残暴，吓得我不知怎么才好。

我正在屋里躲着，突然听到外边一阵鸡飞狗叫，大哭小鬧的声音。往外一看，原来是一群鬼子兵，牵着狼狗挨門挨户的搜查过来。他們每从一家出来，手里都拿着鸡、鴨、面袋、衣服，一群被搶的人跟在后面苦苦哀求。我瞅瞅屋里，也沒有什么值錢的东西，只有半袋面粉在墙角放着，这还是庆桐用一个月的工錢，专门为我生孩子准备的，这是救命粮呀！无论如何不能让鬼子搶去。鬼子越来越近，我慌忙扳住



梯子想把面粉擱在草棚上，鬼子闖進了門，他一看我站在梯子上，就讓一個大狼狗向我撲來，我一害怕，一頭從梯子上栽了下來……等我醒來時，手里的面粉已被鬼子搶走，小孩已流產了，我又一次暈了過去。

後來我又生了個女兒云霞。儘管爹媽受

苦，千難萬難，总算把她熬活了。

走了強盜 來了虎狼

一九四五年抗戰勝利，日本鬼子投降了。蔣介石、宋子文從勞動人民手里劫走了勝利果實，“接管”了紗廠，我又進廠干活了。我想這一下該不餓肚子了！誰知走了強盜，來了虎狼，蔣介石并不比日本鬼子好，他的爪牙把過去在紗廠統治我們的日本把頭捧上了天，我們要斗那些壞蛋，他們却派兵攔住我們，說什麼要有“大國風度”。過去那些甘願做亡國奴，給日本鬼子跪下磕頭的抄身婆和監工，也搖身一變在車間里當起監工來了。

內外棉三廠到了國民黨反動派手里，換了個招牌，叫做中紡一廠，變成蔣介石、宋子文的家產了。那時，市面上的

棉紗漲得很凶，蔣介石、宋子文，拼命地往腰包里撈錢，哪里管工人的死活。車間里，冬天，把人冻得发抖；夏天，車間热得像蒸籠一样，一走进去，就像跳进了火坑，渾身上下沒有一点干地方。人支撐不住就暈倒在机器上，送掉了性命。那时死个人，还不如死条狗，死条狗最多是埋掉，或者扔到郊外就行啦！要是死个人，不是让死者家属赔卖身費，就是給你按个“碰坏机器”的罪名，赔他机器损坏錢。有一天，清鋼車間有个叫阿七的小兄弟，因为两天沒有吃飯，再加上天气悶热，阿七，实在支持不住暈倒在机器上，被鋼絲輾碾了进去，人的尸首除了几根被碾碎的骨头外，什么也沒有了。我們站在血淋淋的鋼絲車边，瞧着慘死的小兄弟，沒有一个不掉泪的。但是，監工和資本家却站在一旁暴跳如雷，只听資本家說：“怎么把我的鋼絲輾碾坏啦！”接着像恶狼似的朝着監工喊道：“这簡直是胡鬧，快把他家的人找来。”当阿七的妹妹扑在机器上为慘死的哥哥哭得死去活来时，逼人的資本家和監工，却在一旁吵着要死者家属包赔机器。你看这是什么世道啊！

双腿残废的苦孩子

我生第七个孩子章根的第二天，就拖着两条腿去上工，真是人在厂，心在家。刚刚落地的孩子沒奶吃咋行呢。在姐妹們的帮助下，我就乘落紗的空闲偷偷跑回去，让章根的嘴沾一沾奶头，再急忙跑回来。有一次，我刚喂过奶跑进車間，只見監工气势汹汹地站在車头，我就知道坏了事。我見他在車头站，就东繞西拐从另外車档轉到車尾去。正赶上姐妹們

落紗，我就低下头一个劲地拔紗管，心想：自己只要落的起劲，說不定监工会发善心，让我躲过这一关。誰知，等我快把几台車落完时，冷不防，监工从我背后抡起毛毬照头上打来，我只觉得一陣巨痛，便倒下了，很快渾身又一陣冷惊，我又被冷水泼醒。“快去落紗！”我还没睜开眼，监工的声音就又叫起来，接着又是一脚。这时，我看地面上泼的水里还有血，就知道头被打破了。可是监工不等我去摸头，就抓住我的头发，像拔萝卜一样，把我从地上提起来，赶着去落紗。从此以后，我再也不敢回去喂奶了。

大人不能回去喂奶，孩子被糟踏得不像人样，每天我下工回到家里，孩子不是光着身子从屎窝里爬出来，就是从床上掉到地下。有一次我下工回到家，看床上沒有了孩子，地下也找不到，我急的找来找去，竟在床下边角落里找到了。这时，孩子渾身冻得烏紫，我把他揣在怀里好长時間，孩子身上才有点热气，可是我又該上工了。就这样天长日久，孩子被糟踏得患了軟骨病，几岁了还不会走，后来两条腿就残废了。

在以后的苦难日子里，我又生了三个孩子，一个活到一岁被鎖在屋里餓死，一个因我劳累过度孩子死在肚里，一个因被监工打在腰上小产了。这就是我解放前生了十个孩子，只活了两个的血泪史。

在幸福的海洋里

霹靂一声响，拨开烏云見太阳。一九四九年，上海解放了，咱們紡織女工，跟全国受压迫的父老兄妹一样，从苦海

中解放了出来。世界什么都变了样，样样都变得使人称心如意，甚至如意得使我吃惊。就拿自己来说吧，一个旧社会被东洋老板、国民党反动派、特务流氓踏在脚底下的人；一个从十二岁起就起早摸黑做牛马，一直做到头发快要发白的纺织女工；一个在旧社会生过十个孩子，只活了两个，而且还有一个残废的饱受苦难的妇女，在解放后没几天，竟当上了纱厂的管理员。起初，我想，我是个大字不识的瞪眼睛，能干得了管理员吗？军代表鼓励我说：“有党有群众什么也不怕。”我想：“对！只要依靠党，遇事和大家商量，还怕什么？”我就硬着腰杆，干起来了。

一九五四年十二月，为了支援新建纱厂，我从上海调到郑州国棉三厂工作。由于领导对自己的培养教育，我的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，一九五六年，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。

解放后，党和政府替咱女工想得周到，劳动保护跟男工一样，怀孕生孩子，那就照顾得更好。从女工怀孕那天起，就不让做重活，到了七个月，每天就少干一个小时，去孕妇休息室里，躺在睡椅上痛痛快快地休息。生下孩子还有五十六天的假期，工资照发还不说，另外还给劳保费（出生钱）、买红糖、送牛奶、买头等白面。检查费、接生费也不必操心，医药费公家一概给包下来啦！现在的纺织女工在党和毛主席的领导下，可真有福呀！不过千万要记住：身在福中要知福，不要忘记前人苦。

（中共郑州国棉三厂党委通讯组整理 徐秀英插图）

三千里流浪記

鄭州紡織機械廠工人 宋福山

每當我同年青工人一起，走進我們工廠大門和車間的時候，我總為我們今天的幸福生活感到萬分高興。在新社會里，我們工人的工作由國家分配，工資按月發，有了病公費醫療，吃飯有食堂，睡覺有宿舍，學習有圖書室、閱覽室……所有這些，在今天看來都是十分平常的事情；可是，在舊社會里，對於這些事情，我連想都沒有想過。那時，工人只有失業的自由，餓肚子的自由。

我是從十九歲開始做工的，計算起來，到現在已經有三十八個年頭了。這裡要講的，就是我在舊社會受苦受難的悲慘經歷。

我原籍是河北省易縣。解放前，全家二十四口人，在地主階級的剝削、壓迫下，家里人餓死的餓死，逃走的逃走，最後只留下了我一個人。給地主扛了幾十年長工的祖父、父

亲和叔父，临死时連口棺材都沒有，全是用席片一卷，挖个坑就埋了。

我十三岁就給地主赵老礼家放牛。晚上睡在牛圈里，冷了就貼着牛的肚皮取暖。有一次，放牛回来晚了，赵老礼把我拴在牛桩上打得头破血流，几天后渾身成疮化脓，动一动就疼的钻心。十八岁时，我給本村地主傅老冲家做飯，有一次我端着一盆飯刚跨出門檻，被狗撞翻了。傅老冲一见，走到我跟前，拳打脚踢，嘴里还罵着：“狗娘养的，你这个混蛋干啥吃的！”因为受不住地主的压迫和凌辱，在一个漆黑的夜晚，我从傅老冲家跳墙逃跑了。

一九二六年我十九岁时，离开家乡，被招募到东北去修奉（天）海（龙）铁路。我想，这回可找到了飯碗，往后再不受地主的气了。誰知道資本家、工头和地主的心腸一样狠毒。在那里，每天开山筑路，一二百斤重的大石头，从天明背到天黑。資本家手下有好多大把头、二把头，他們成天不干活，手拿着棍棒、皮鞭，看哪个工人干得慢一点，抬手就打。抽打了你，还不准吭声，要是頂他几句，抽打得更凶。有一次，資本家让我搬石头，一百多斤的大石头块，我哪能搬得起呀，只得让别人帮忙，把石块放在我脊梁上。誰知那人刚把石头搬起来，一失手掉了下来，正好砸在我右脚上，把脚面骨砸坏了。資本家不仅不給医治，連飯也不让吃。无奈，我只得拄着棍子，忍着剜心的疼痛，到四乡討飯。

做工那时候，每天吃的是包谷面或高粱米，也沒有菜。六十多口人，一个小鍋煮飯，哪能吃好呢？工人们不下工就餓了，一听说开飯，別管飯熟不熟就吃起来，一年四季我們吃的都是半生不熟的窝窝头，喝着照見人影的稀飯湯。論工

錢，虽然总公司也假仁假义地規定每人做一月工，最高工資可以拿四五十元，可是經過承包的东河公司資本家的手，一下子就扣去一半，再經領班大头子的手，七折八扣，最后到工人手里的不过十分之三。他們像榨油



的油閘一样，过一道关口榨一次油，层层剝削，就这样还常常扣住工錢不发。結果，一年到头，只有工人干的活，沒有工人拿的錢。那时候，我們工人成了他們的“賺錢机器”，每月劳动的果实，絕大部分装进了資本家的腰包。一次，一連九个月不发工錢，逼得我們实在沒办法了，修路的六千多名工人抱在一起，就把东河公司砸了。

后来，我离开东北，想找一个待人公道的地方做工。跑到北京附近的軍庄，听說一家叫永兴源的石灰窑上要人，我就急忙去报名。誰知一到窑上，根本沒有干或不干的自由，每天要做十七八个小时的活，累得腰断骨折。中午吃飯的时候，窑主点上一支香，工人速吃飯带休息不能超过烧一支香的时间，香一着完就得上工。就这样，干一天活吃三頓飯，

不干活就沒有飯吃。每逢遇着下雨天不能燒窑，工人就得出外討飯吃。

在石灰窑上做工那年，我才二十二岁，正是长身子的时候。可是饥饿、劳累，把我的身体折磨得像芦柴棒一样干瘦。到第三年，我害了血汗病，一连三天，从鼻子里、嘴里往外淌血条，瘦弱得不能走路，整天躺在地上像死人一般。苍蝇围着我嗡嗡地飞来飞去，眼窝里、鼻子上都长了蛆，只是心口里还留一口气，真是奄奄一息了。这时，心肠狠毒的窑主馬应魁走到我跟前，看了看说：“这小子反正不行了，把他埋掉算啦！”天下穷人心连心。当时多亏和我一块做工的李茂春父子俩，上前拦住说：“不行！他还有口气，不能活活埋掉。”后来，馬应魁说我害的是传染病，不让我在窑上住。李茂春父子俩把我抬到山沟里的一间破草庵里，每天抽空给我送饭送水，还借钱为我请医生看病，在他们父子的关照下，我真是死里逃生，躺了三个多月病才好了。

病好以后，为了吃饭，我不得不到附近的门头沟煤矿找活干。这家煤矿分五个柜头，我被分到一号柜头上做工。柜头上虽然也说每天工钱四毛五分，可是经过资本家和工头千方百计地克扣，做一天工只发给一毛钱的铜子、一毛钱的面。当时在市场上，一毛钱能换四十个铜子、买三斤面，他们却只给三十八个铜子、二斤半面。剩余的工钱还常常扣住不发，大家明明知道吃亏，也没有办法。那时在矿上做工，不管吃，也不管住，下了班各人领面回去自己找地方做饭，夜晚睡在店里，店主一夜还收十个铜子。

旧社会的煤窑上，没有什么安全设备和劳动保护用品。在窑下干活的人，差不多都是一丝不挂，光着屁股，全身被

煤染得烏黑，人們都喊我們是“煤黑子”。在這裡做工的人都
知道“死了不用埋，老塘是棺材”，煤窑就像一座人間“地
獄”。大伙明知是死路，也不得不往里闖。一次，在窑下做
工，突然塌了頂，我們在一塊做工的十二个人，砸死了六个。
那天，矿上工人家屬領着孩子，惊慌失措地寻找自己的亲
人，妇女和孩子哭着喊着，悲惨极了。家里有人来領尸的，
資本家只給二十元押命錢，沒人領尸的，用席片一捆，往山
沟里一扔，連埋也不埋。当时我的手脚受了重伤，被抬到窑
上，資本家一看我受了伤，不能再給他們卖命干活了，就推
出門外不管了，不要說治伤，連飯也不給吃。沒有办法，我
只好找同路来的工友赵子元借錢求生。

伤好后，我又到另一个矿上去干活。一次，下窑后突然
透了水，万恶的矿主为了他們的利潤，使別道窑能照常干
活，竟不顧我們三十二个人的生命，把几道閘門全放下了，
还灌洋灰封住。当时，即使有通天的本領，也难逃出去。我
想，这回只有活埋在窑里了。后来水势慢慢小了，一个当地
的工人說：“我們死不了啦，这是从一个小煤窑上过来的一
股死水。如果碰到別的水，咱們就沒救了。”大伙就跟着他
順着水眼这扒扒，那刨刨，最后终于从另一个窑洞里爬出来
了。出来后，矿主見了我們，只說了一句：“爬出来了，不
該你們死！”就算完結啦。

在那人吃人的旧社会里，我真是东奔西跑，到处漂泊。
离开煤窑，我从北京跑到西安做工。在西安的成丰面粉厂、
紅丰紗厂、和合面粉厂、义聚財鉄工厂……差不多所有的大
工厂我都干过来了，但無論在哪个工厂，工人都是一样受剝
削、受压迫。

回想起来，我由十九岁那年开始做工，到一九四九年解放，在旧社会里共失业十几次；从东北到西安沿途做工，流浪过三千多里的路程；我修过铁路，下过煤窑，开过山，当过钳工，拉过排子车，在码头上当过搬运工，给资本家做过饭……可是，做了大半辈子工，出了力，受了气，自己还养活不住自己。四十多岁了，还是单身一个。一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后，在领导上和同志们的关怀帮助下，我才成了家。现在我有两个孩子，全家人过着幸福的生活。

在旧社会，我们工人生老病死没有人管，年纪大了，资本家就一脚踢开。那时候越老生活越悲惨。现在党对我们老工人，无论在政治上、生活上都特别关怀，把我们当成宝贝看待。想想这些，我不止一次地流出了感激的热泪。

（李金声整理 端 倪插图）

国仇家恨不能忘

新乡中原纺织厂工人 赵锡海

当我看见自己两条腿上那一块块紫青色伤疤的时候，千仇万恨就一齐涌上了心头。

我永远不能忘记爸爸妈妈的惨死，不能忘记失散的亲人，不能忘记被拆散了的家。这些血泪仇是日本侵略者和汉奸给我造成的。

毁灭家庭的仇恨

我的老家原来住在新乡近郊的金家营村，家中有爸爸、妈妈、哥哥、姐姐、两个妹妹和我。一家七口人靠七亩多薄地过活。

一九三八年，我八岁的时候，日本兵就占据了新乡一带。那年冬季，一天，爸爸进城去买东西，直到天黑还没回

来，媽媽怕他出事，就叫哥哥出去寻找；到第二天，还不見爸爸回来，哥哥也沒有回来。媽媽想着一定是出了事，痛哭着托亲戚邻居去打听消息。第四天，听人說城西边高村的一口井里，有日本人新丢进去的几具尸首，媽媽像发了疯似的到处求人去打捞，捞出的尸体中，果然有我爸爸，他的手脚被捆绑着，身上被刺刀戳了几个血窟窿。媽媽看到爸爸的尸体，哭得死去活来。一向为人善良的爸爸为什么被杀了呢？当时誰也說不清，誰也不敢去和杀人如麻的日本鬼子讲理。

爸爸的尸首找到了，哥哥的下落还一时打听不清，媽媽卖了二亩地，一面买口棺材埋葬了爸爸，一面請人寻找失踪的哥哥。过了十多天，从驻扎在城里的伪軍营房里传出了口信，說哥哥被抓去当兵了，只有花錢才能贖回来。失掉了一个亲人，怎么能再失掉第二个亲人呢！媽媽哭着說：“舍家破财，也得把人救出来。”于是她又忍痛卖了五亩地，才算把哥哥贖回来了。

失掉了爸爸，卖光了土地，一家人还靠什么过活呢？媽媽难过极了，可是，她还是含着泪对我们說：“佃地、要飯，也得把你們拉扯大。”我当时虽說不大懂事，也知道媽媽是全家唯一的靠山了。誰料到，爸爸死后不到半个月，家中又出了塌天大祸。

一天夜里，媽媽哭了半夜以后刚刚睡着，忽听见有人狠狠地砸門，媽媽刚穿起衣服，还没来得及点灯，几个拿手电筒的人就冲进了屋里。从手电的光里，可以看見他們有的穿着伪軍衣服，有的穿着便衣。一进屋就逼着媽媽說：“快把卖地的錢拿出来！”媽媽說：“卖地的錢贖人还不够哩，沒



有剩下錢呀！”那些家伙不相信，到处乱翻乱搜，沒搜到什么东西，就把媽媽抓走了。

媽媽被抓走时，連一句話也沒来得及說，大門敞開，冷風卷进了黑洞洞的屋里，我們兄妹几个吓得紧紧靠在一起，盼望媽媽能很快地回来。可是一直等到第二天太阳出来，还不見媽媽的影子，姐姐急忙出去寻找。到哪里去找呢？村子里誰也不知道，后来听村南头的一家住戶說：后半夜听见南地里有女人的喊叫声。姐姐一听，便一直向南地跑去，果然在地主家的井台上，发现了媽媽的破衣服——我那可怜的媽媽被打死后扔到井里了。

在伪軍土匪抓走媽媽的那一天晚上，刚刚贖回来的哥哥睡在另外一間屋里，他一听见砸門声，以为是来抓他的，就跳出后窗戶逃跑了。从此他再也沒有回来，一直到现在还杳无音訊。

爸爸媽媽在世的时候，姐姐就有了婆家，爹媽一死，人家就把姐姐領走了。姐姐走了以后，两个小妹妹在邻居們的关照下，为了討个活命，也被別人領走了。一个欢欢乐乐的家庭，不到二十天，就只剩下我这一个孤苦伶仃的孩子。我

走投无路，为了活下去，只好含着悲愤的眼泪，挟着一只破碗，在插着太阳旗的新乡街头，来回讨饭。

讨饭头两天，什么也没有要到，只好空着肚子回到了金家营的村头。往哪里去呢？晚上，我扒在自己冰冷的门框上，迎着寒风，呜呜咽咽地哭起来。远房叔叔看我可怜，便把我送到了在焦作道清路上当道班工人的舅舅那里。

舅舅家人多收入少，生活本来难以维持，再增加一个吃闲饭的，日子就更不好过了。我天天拾煤核，拾柴禾，为的是给舅舅家节省一些开支。后来又给邻村地主家当了个只吃饭不要钱的牧童。狠心的地主想从我这个九岁的孩子身上榨取一些油水，每天除了放牛以外，还要割两捆草。繁重的劳动折磨得我皮包骨头，就这地主还觉得养活我是个“倒贴货”，太吃亏，不到两年时间，便把我赶出来了。

矿井苦役伤两腿

十一岁那年，我总算找到了饭碗——经过邻居们介绍到焦作煤矿上当童工。

我第一次被送下那黑洞洞、阴森森的矿井的时候，身上的冷汗把破棉衣都浸湿了。一到井底，浑身脱个精光就拉起拖筐干活，又湿又重的拖筐，再加上五六十斤煤炭，它的重量远远超过了我这个年幼体弱的童工的体力。就这样，每天都要起早搭黑不停地拖上十二个小时，连吃饭的空隙也没有，饿了啃一口干粮，渴了就趴下喝口矿井里的煤水。巷道窄，坡度大，窑水乱滴，脚下光滑，出一身汗，才能挣扎着爬几步。每天干罢活一出井口，连抬脚换步的力气都没有，

有时候，一头倒在路边就睡着了。

有一天，那些平时老蹲在井上的监工們，一窝蜂地拥到了井下，一边揮着木棒，一边吆喝着：“快拉，快走，太君来检查啦！”不一会一个横眉楞眼的日本鬼子下来了，这家伙一来，那些汉奸咋呼得就更凶啦。平时沒有这些家伙在場的时候，装筐的老工人很同情我，只装半筐，这一回可馬虎不得，拖筐装得满满的，我怎么也拉不动。我正在拼命的拖拉，不巧，那个日本人在一群汉奸的簇拥下，走到我面前来了。那家伙一看见我，便把脸往下一沉，向旁边一个监工咕囔了几句，那个走狗便举起棍子向我走来，口里罵着：“媽的，快拉！”說着，他举起木棍照我干瘦的身上打来，我用力一跑，被一个煤块絆倒了，两条干枯的腿，碰在煤块的楞角上，当时就疼昏过去了。

当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只觉得两腿疼痛，渾身无力，血和煤泥混和在一起，无法辨清伤势。工人們都是赤裸裸的，那有布条給我包伤呢！在阴森潮湿的巷道里，我抱着受伤的双腿一直等到下班以后，才被工人們扶回家去。

第二天，我本想歇一歇再下井，可是同行的都劝我道：

“不行啊，若有三分力气，还是到井下去吧；挂一天号，飯碗就丢了。”听了这些話，再看一看舅舅一家干枯忧愁的面容，不下井吃什么呢？没办法我只好下井去了。伤口上包着的一层破布，很快被水渗透了，凉水浸着伤口，疼痛难忍，而且漸漸地发炎肿胀了。过了几天，伤口由肿胀变为潰烂，潰烂面一天天扩大。不仅无錢医治腿伤，六七十斤重的拖筐，每天照旧得拉十二个小时。眼看我这一条小命就要丢到井下，只得不顾一切地歇了两天。两天后伤势并未好轉

多少，又得赶快去上工，为的是怕被开除。誰知道鬼子和汉奸早就看出从我身上榨不出什么油水，他們还是把我开除了。

那时候正逢河南遭旱灾，舅舅这个穷道班工人的家也无法維持了，一家几口和我一样干枯瘦弱，那来的力量替我养伤呢！万般无奈，我只好去找姐姐。姐姐是个出嫁不久的人，在婆家毫无家庭地位，她不敢收留我，只会抱着我哭。我看出了姐姐的难处，更不愿意让眼前这个唯一的亲人为我受連累，便强打精神安慰姐姐說：“往徐州逃荒的人很多，听說那里年成很好，我到那里总餓不着，等年成好了再回来看你。”姐姐明知道这是生离死别，可她也无力养活我，更不忍心看着我在她面前餓死，只好含着泪說：“走吧，討条活路也好！”

带着对姐姐的留恋，怀着对敌人的仇恨，含着悲憤的眼泪，拖着两条潰烂的腿，我离开了无家的故乡。

长 工 恨

从新乡南边的小冀車站扒車到开封，又从开封扒車到商丘，經過几次扒車，受过无数次打罵，在一个大雪紛飞的黄昏，我終于到了想望已久的徐州。徐州同样挂着日本的膏药旗，同样是汉奸流氓横行的地方。街头上到处都是像我这样无家可归的人。我在白慘慘的雪地上挨門挨戶地跑了半天，受的气比要的飯还多，到了晚上，无处安身，只好靠在一家飯館的炉墙外面过夜。看来在徐州謀生无望，我只得往乡下跑，后来流落到銅山县一个叫集保村的地方。白天挨門乞

討，夜晚宿在井边的茅屋里。我的处境引起了一位姓王的穷大娘的同情，经过她老人家的帮助，我到了个姓权的地主家去放羊，条件仍然是只管吃，不给工钱。大娘是一片好心，她对我说：“有个吃饭的地方总比要饭强。”地主不放心我这个“外来货”，还让王大娘给他立了个字据，上面写着：只能解雇，不准逃跑，更不能拐了东西逃跑，如若逃跑，一切损失由王家包赔。这实际上是我的一张卖身文书啊！

刚刚离开日本人的地狱，我又陷进了地主阶级的牢笼。一天到晚，一年到头，地主的一群肥羊便是我这瘦孩子的伙伴。风里、雪里、雨里，翻山、爬坡、趟水、过河，我总是赤着两只脚，拖着两条溃烂的腿，跟着羊群蹒跚地走着。夏天羊儿喝着微山湖里的清水，我就坐到湖边，咬紧牙关，噙着眼泪，从溃烂的腿上一条一条向外挑着蛆虫，每向外挑一条就疼得我出一身冷汗。蛆虫挑完以后，血水与脓液就混合在一起往外流，无钱看病，无人过问，只能用湖水擦洗擦洗。等到快回村的时候，还得赶快用破布把伤处包住，只怕主人闻到那腥臭的气味不用我，丢掉了饭碗。冬天，羊儿自由地吃着山上的枯草，我就生起一堆篝火，烤着那疼痒难忍的腿伤，为的是不让它冻坏。守着一堆篝火，我常常想起那破灭的家和死亡离散了的亲人，想起矿井下面那挣断筋骨的苦日子，想起我腿上受伤的经过，这一切都是日本鬼子造成的……原来我以为到地主家里干活，能吃饱，能穿暖，腿上的伤也会慢慢地好起来的，谁知道地主的心也是这样坏，对待穷人都是同样的毒辣、残暴。

有一天，由于风雪太大，我匆匆忙忙把羊赶回圈里，地主权兴盛出来一查数，说是少了一只羊，而且一口咬定是我

偷卖了，不容分说，吊起来就是一顿毒打。鞭子抽在我的身上，也打在我腿上的伤处，旧伤没好，又加上了新伤，鲜血和旧脓沾满了地主的鞭子，他仍不肯罢休。几个扛长工的穷兄弟实在看不下去了，就一齐出面向地主讲情，地主根本不买他们的账，直到他们提出从几个人的工钱中扣除一只羊价以后，地主才松了手。从那以后，我两条腿上的伤就更大了。从脚脖上一直溃烂到膝盖下，拖着这伤势越来越重的腿，我给地主权兴盛整整干了七年活！劳累一天之后，羊群都静静地入睡了，我这个放羊人却抱着疼痛入骨的腿翻来复去地睡不着。这疼痛常常使我想起那些残暴的日本侵略者和恶毒的地主，他们损坏了我的双腿，残害着我的生命。这“恨”字刻在我的骨髓里，刻在了我的心上，一种报仇的愿望，常常使我浑身发热。

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

一九四八年，当我苦难的长工生活进入第八个年头的时候，微山湖边传来了一阵枪声，听人家说，解放军就要打过来了。这枪声给我带来了喜悦和希望，这枪声给地主权兴盛带来了恐惧。当他听到解放军的枪声以后，这家伙就装起穷来了。他埋藏了粮食，分散了财产，把雇工们一个一个解雇了，我也被撵出了门。七年多的雇工生活除了使腿上的伤势越来越重之外，别的一无所获。当时我想回河南，心想别的不给，几个路费东家总会给吧，谁料想路费没要来，那家伙还要向我算七年多的饭钱！我瞪了那个不讲理的家伙一眼，怀着一肚子怒气，走出了地主的牢笼。

那时候我已經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了，腿虽然有伤，还是能干活的，我就靠打短工混飯吃，这样的日子过了不久，解放軍就解放了銅山县。在异乡的土地上，我和千千万万穷兄弟一起，流着眼泪迎了解放。更令人兴奋的是，在解放軍的行列里，我竟遇見了一个熟人，他姓张，和我一起給权兴盛当过长工，經他一介紹我就参加了解放軍。

当我第一次换上嶄新的軍装，領到厚厚的被子，和同志們生活在一起的时候，好像又回到十年以前那个温暖的家里一样。当連长拍着我的肩头，亲切地叫着“小赵”，笑咪咪地向我讲着革命道理的时候，我仿佛又找到了亲人。我只怕离开这个大家庭，只怕离开这些亲人，因此，我不敢給領導上說腿上有伤，怕領導上知道后不让參軍。我一直跟着部队行軍打仗、站崗、送信，腿上虽然疼，心里却很舒坦。沒有多久，我的秘密終於被我們的政委識破了。

有一天，我跟于政委到城里去开会，于政委邀我到澡塘里去洗澡。开始我說不想洗，于政委說行軍打仗这么多天，怎能不洗澡呢！后来我推說沒进过澡塘不会洗，于政委說他帮我洗，我实在推脫不开了，只好把腿上有伤的实情告訴了政委。于政委一听連忙拉起我的褲腿要看伤势，当于政委看見了我那潰烂的两腿时，好像疼在他的心上一样，他脸色蜡黄，眉毛紧縮在一起，一句話沒說，扶着我就往医院走。

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我向守候在身旁的于政委傾訴了受伤的經過，于政委咬着牙根，听完了我的訴說以后說：“好好养伤吧，伤好了再去报仇，給自己报仇，給天下受压迫受剝削的人报仇。”他还批評我有伤为什么不早說。他看着医生給我检查伤势，看着护士給我上药，直到医生說保証能医治

好的时候，他又安慰了我一番，才离开了医院。于政委走了以后，我不禁哭了起来。在日本人的矿井下我流过泪，在地主的庄园里我也流过泪，那是悲痛的泪，仇恨的泪，那泪水是苦的；在于政委的关怀下，我第一次流出了感激的热泪，我感激于政委对我的关怀，感激党的恩情。一个多月以后，我溃烂了八年之久的腿伤完全治疗好了，这创伤是民族敌人与阶级敌人给我造成的。这创伤是共产党给我治疗好的。当我抬起两条恢复了健康的腿，蹦着跳着跑回部队的时候，我更感到党的恩情的深厚，不禁唱起了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”的歌曲。

回到部队以后，我牢牢地记着于政委的那句话：伤好了以后，给自己报仇，给天下受压迫、受剥削的父老兄弟报仇；我也记起了当我脱下满是窟窿、钻满虱子的衣服，换上新军装的时候，连长提着我的破衣服说的话：“小赵，不能忘记，天下还有千千万万的人穿着这样破衣裳呢！”

十五年来，这些话我一直牢记在心里，并且还常常讲给



我爱人和孩子們听。

我不能忘記日本鬼子和地主階級欠下的仇恨，更不能忘記黨的恩情。為了報答黨，我決心聽黨的話，決心用這兩條恢復了健康的腿，為黨、為人民多作一些工作。在解放戰爭時期，我緊緊地跟着部隊，戰鬥在華東戰場上，完成了領導上交給我的每一項任務。經過戰鬥的考驗，一九四九年我光榮地參加了中國共產黨。以後，我又報名參加了空軍部隊的建設，我曾下定決心當一名堅強的空軍戰士，使祖國再不受帝國主義的侵略，使階級敵人永遠不能復辟。但是，因為我的腰部在煤礦下做工時受了內傷，身體條件不適合當空軍，組織上就讓我轉業復員了。一九五二年我轉業到新鄉市中原紡織廠當警衛員，任務是保護工廠，也是直接保衛社會主義建設，我高高兴兴地接受了這個任務。一九五三年，廠領導又調我到鍋爐車間當工人，這工作又脏又重，有人擔心我不會去干，我怎麼能不干呢，這是為社會主義建設直接出力啊！到現在，我已經整整燒了十年鍋爐了。十年來，我集中精力工作，還抽空鑽研技術和學習文化，在黨的培養教育下，現在我是六級鍋爐工，有了初中畢業的文化水平，出席過市的先進生產者代表會，被選為五好民兵。但是我毫不滿足，還要努力提高文化和技術，把工作做得更好。

我永遠不能忘記黨的恩情。黨救了我的生命，黨使我恢復了健康，黨使我懂得了革命的道理，黨給了我今天的榮譽和幸福……

我永遠記着：世界上還有許許多多穿破衣服的人哩！
我要為他們的解放貢獻力量！

（緝廣宗整理 林紹先插圖）

两条腿的血泪仇

漯河市残废工人 敬文升

提起我在旧社会受的苦，真是不知道从哪一件说起好。逃荒要饭，进工厂当学徒受罪我都不说，今天就光说说我这两条半截腿的事。

一九四五年，我在漯河华信烟厂做工。烟厂的掌柜是毛金修、阎洪宾、袁明庆，还有一个工头叫胡文甫，外号叫胡大胖子。那时工人们为了混碗饭吃，给他们没明没夜地干活。我记得这一年快过年的时候，掌柜只给每人发了一元多钱工资。

这年腊月间，人们都在准备过年，烟也卖得特别快，资本家看到有利可图，就叫胡大胖子监工，逼着工人一天二十四小时速着干。胡大胖子白天睡大头觉，夜晚可就有精神了，这家伙掂着棍子来回窜，见谁一打盹，劈头就是一棍子。

正月二十三这天夜里，风很大，天阴森森的。那时候，

我是炕烟工。唉，提起炕烟工，那才真是活受罪。那时候炕烟用的是柴炭，炕房里像火山一样，燎得人喘不过气来。当时，我已经连续不断地干了四十六天，资本家从来没有让我好好地休息过一天，累得我头昏脑胀，走起路来，头轰轰响，老想晕倒，饭也吃不下去。我实在是支持不下去了，就壮着胆子去向掌柜请假。我说：“毛掌柜，我病得实在不能再干活了，想请个假去看看。”他听说我要请假，两眼一瞪，说：“你请假谁替你炕烟？要看病你找个人来替你。”假没请准不说，反而当着许多工人的面把我痛骂了一顿，说我不好好干。当时我是敢怒不敢言，两眼含着泪，拉着两条沉重的腿又回炕房去了。

回到炕房里，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钟了。这时候，大堆炭火烧得正旺，一股热气向我扑来。我走了几步，觉着天旋地转，眼冒金星。我刚想离开火炕边，谁知就在这个时候，猛地晕倒在火边了。疼醒后，我一边挣扎着往外爬，一边呼喊着：救人呀！救人呀！当我挣扎到炕边，刚想站起来的时候，又晕了过去，以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。

过了很久，我才知道，当时有个开车工，名叫李顺海，是他第一个听到了我喊救命的声音，就急忙向大伙说：“不好了，有谁在喊救命，怕是炕烟房里的老敬吧！”工友们一听，马上向炕房跑去。老工人黄洪山提了个灯笼跑在最前头。进屋一看，天哪！我的衣服早烧成了灰，两只腿烧得吱吱响，骨头已经露了出来。看到这种情景，大伙啥也不顾，就把我用木板抬了出来，有的给我找水喝，有的给我找药。

资本家们都在院子东边的楼上住着。李顺海、李顺喜等一些工友，跑到资本家门口拍着门说：“毛掌柜、阎掌柜，



老敬的腿烧坏了！烧坏人啦！”可是，喊了半个钟头，没有一个人搭腔。后来，大伙看资本家不理，就兑了几个钱，准备派人到街上去买急救药。哪知胡大胖子这家伙偏偏又不叫开门，怕我们偷东西出去。人在危急，哪能再迟延！没法，大伙又到东楼下去喊叫。掌柜仍然不起来，更可恨的是，这时胡大胖子还逼着大伙非上工

不可。大伙没有理会他。一直喊叫到下两点，还是无效。怎么办？大伙一合计：“停机！”这个办法果然有效。掌柜听见机器停了，才打开了大门。大伙刚把我抬出大门，胡大胖子就砰地一声把大门落了锁。

烟厂对门，有个私人小医院。到那里他们一看伤势很严重，张口就要四五百元，并且还要资本家亲自立字据。大伙一商量，决定一方面去找资本家交涉，另一方面有钱的人回去兑钱。和资本家交涉没有成功，这时工友靳占首先把他积攒了三年多的四元五角钱拿了出来，给我买了药，打了两针止痛针，吃了几片止痛片和药水。医院看我们没有钱，资本家也不给写字据，说治不了，硬逼着将我抬了出来。

当天夜里四点钟左右，风越刮越大，冷风吹到身上，疼得更加厉害了，半小时就晕过去几次。我躺在木板上，喊叫

一陣，昏迷一陣。这时，大伙又把我抬到了基督教教会医院，就是现在漯河市沙河岸边那个医院。那时候的医院可不是为咱办的呀！教会医院更是这样，有钱的抬进去，无钱的推出来。

一抬进医院，一位戴眼镜的医生斯斯文文地来到我的身边。他一看我的伤势，说声住院，扭头就走了。

一听说叫住院，大伙想着有希望。可是，到会计室一问，会计开口就要先交五百元。天哪！向哪里去弄五百块钱呢？只得再去找掌柜交涉。

工人王起德找到阎掌柜，一说要借钱，阎掌柜板起面孔，恶狠狠地說：“烧伤是他自己不小心，要治你们给他治，与厂方无关。”

第二天，也就是正月二十四日中午，我仍然在医院门外边的一块木板上躺着，两条露出骨头的腿冻得发紫，伤势越来越重。几个工人弟兄急得团团转。无奈，只好给医院说好话，并言明集体立约作保。医院仍不同意。真是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。工友们一商量，又派工友黄洪山等几个人再去找资本家。厂方看这次去的人多，怕再不管要闹出大事，才勉强答应派职员先去医院接洽，立了字据。

住院以后，医生随便检查了一下，就决定要锯腿。锯腿对我来说，不过是保存一条命，可是对资本家来说，钱比我的命更要紧。资本家袁明庆和工头胡大胖子就又使出了诡计，他们一方面向医院交涉要抽回字据，说经济和人身厂方不負責任；另一方面又派人叫我父母亲来，想来个顺水推舟。工人们听说资本家要抽字据，都一齐赶到医院来，同资本家讲理。吓得资本家没敢再提抽字据这件事。

可是，我的父母到底是来了，老人家看着我那不像人形的样子，坐到我身边，哭得死去活来。

二十九日的下午，是我永生也忘不了的。我昏昏迷迷地躺在手术床上，什么也不知道。当我醒过来时，我的双腿已经从膝盖下边锯了下来。

他们把我的腿随便锯下来后，又不给上好药，伤口一直往外流血水，慢慢地开始腐烂了。就这样，在医院躺了一两个月后，伤口不仅没有长住，腐烂的地方越来越大，伤势更加恶化了。

医院看情况不妙，在一天夜里，又把我抬到了手术室，约摸有两三个钟头的时间，他们又把我抬回了病房。第二天一醒来，才发觉我的两条腿又被锯去了一截，是从大腿根下约有三寸长的地方锯下的。当时，我一看又锯掉了一截，马上晕过去了。两个月以后，伤势还没有完全好，资本家毛金修、閻洪宾就硬把我赶出了医院。出院后连厂门都不叫进，他们就把我开除了。

解放后，华信烟厂因资本家在解放时抽走了资金，已经垮台，其他福华等几个小烟厂合并成漯河烟厂。市领导为了照顾我们一家生活，介绍我爱人进漯河烟厂工作。我行动不便，逢年过节或刮风下雨，厂工会经常派人帮我买煤买面。我偶尔有个头疼发烧，厂里领导就派医生来给我看病，有时领导还亲自登门问寒问暖。现在我家共六个人，大儿子现在是解放军的五好战士，大女儿玉凤上了学。像我这样的人，要不是解放翻了身，有十个、一百个，也不知道饿死到哪里去啦。想想这一切，我从心里感谢共产党，感谢毛主席。

（吕桂兰、应时雨、王今川、宋秉坤整理 山思发插图）

风雨漂泊苦邮差

郑州市邮电局包裹班班长 李远成

提起我在旧社会干邮政工作所受的苦，就是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啊！

我是郑州市北关人，我爹李金来，远在五十多年以前就进了伪邮局，当一名小車夫。那时的邮政控制在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手里。小車夫是最低級的临时差，收入少，可每天得工作十二小时，倒班时得干一天一夜。那堆积如山的邮筐，全靠这些小車夫穿过长长的站台和难行的铁路叉道，一袋一袋地背上火車，又一袋一袋地扛下来。重重的邮包，压得我爹喘不过气来。当时，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招雇許多劳工运往外国。我爹一来怕被运到外国当苦役，二来每月等不到开支就沒吃沒烧，因此进局不久就想另謀生路。誰知有一次沒去上班，第二天就被抓进衙門，坐了一个多月的班房。出来后，伪局长把我爹叫到办公室里，狠狠地训斥了一頓，

說：“小車夫是临时的，只要在这里一天，就得属我管，以后你不能随便走！”

苦熬了十几年，我爹才补了个杂差，成天守在局里，听候使唤，啥笨活都得干。就是这样像牛馬一样的苦干，也并没有改变我家穷困的处境。

一九三一年，我十五岁。經我爹多次拜托这师爷、那师爷，才把我带进邮局里当一名小車夫。这时的小車夫，比我爹那时候所受的苦还多，可是固定工資却沒有了。每天一早，我就上局里帮着拆袋、扛袋、看袋，忙个不停。等到正式人員下班以后，才能靠送包裹拿几个錢。一月送不到二十天，可得天天守在局里。就这样，我苦熬了八个年头。

提起我爹，郑州伪邮局的老人都很清楚：是个勤劳朴实的忠厚人。在邮局干了三十多年，却遭到了悲惨的下場。

“七七”事变后，日本鬼子进逼中原，郑州經常遭到空袭。当时邮局里沒有起碼的防空設備，只浅浅地挖了个土坑。規定小車夫和杂差，在工作时一概不准离开現場。一九三八年，阴历正月十五那天，我爹和平常一样去得很早。不料七点多钟就拉警报，局长、高級職員都乘汽車跑了，而小車夫、杂差只好死守着。日本鬼子的飞机一来，就劈里拍拉炸个不停，几个炸弹正好扔在局里。飞机过后一看，墙倒屋塌，可怜二十一个小車夫和杂差全压在防空洞里了。家屬們奔到局里，哭声震天，爭着往乱瓦堆里找亲人。我一边流泪，一边搬砖挖土，好容易才在局长花园里倒塌的墙角下，扒出了我爹的尸体。

爹死后，日子更难过了，我挑起了全家五口人的生活重担。干起活来，沒有老人的指点，心里总是沒数。可是又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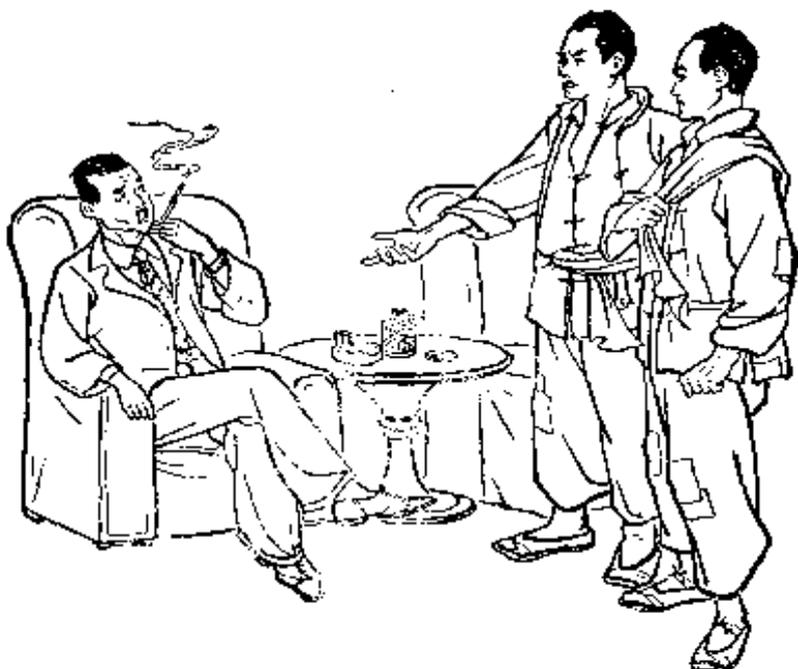
想：凭着卖力气吃饭，不坏良心，总不会出什么事。岂不知在旧社会，就是坐在屋里，也会祸从天降。

这年冬天，郑州四周的铁路被国民党反动派全扒了，东至中牟，西至荥阳，南至新郑，北至滎泽口，全改了早班。我们这些小車夫，大都跑开邮班了。我跑得最多的是郑州至新郑的昼夜兼程班，去时經謝庄、薛店一百一十里，回来經郭店九十里。数九寒天，北风呼呼地刮着，每天近黄昏，我就带着扁担、绳子，提着馍来到局里，拿到排单就担起六七十斤重的邮袋，连夜赶路。路上还要提防着土匪劫路。邮局里规定每小时走十华里，走不够就罚。我总是天不明赶到新郑。一停下来，两腿就像根木棍，又紅又肿。在新郑迷迷糊糊地睡上四五个钟头，到了上午十点钟，又該像牲口一样，馱着邮件往回赶。当时，邮局里叫我們长期差，实际上也都是临时性的，只不过是无休止地干活，馬不停蹄地赶路罢了。

第二年三月間，国民党反动派抓壮丁很厉害，抓走了我們一个人。我們这些长期差商議了一下：既然邮局不发給我們“号坎”，起碼也該給我們一个袖章，穷哥儿們推我和馬国正去跟伪局长交涉。伪局长說：“长期差哪来的袖章？”我說：“俺們是邮局的人，为啥不給个証明？俺們可以自己出錢做袖章，这也是为了安全呀！”伪局长仍不答应。回来后，穷哥儿們气极了，扁担一摔都不想干了。这一下伪局长慌了，把我和馬国正找去，很“和气”地說：“你們先上班，以后再給你們做。”

誰知，第二天我上局里，伪局长說：“李运成！以后……你就不用来了。”为了一个袖章，竟把我和馬国正开除了。天下哪有讲理的地方啊！

俩月过去了，我也沒找到工作，一家老小儿张嘴要吃，逼得我走投无路。我想上銅川煤窑去，媽媽哭着不愿意。幸好麦后邮局里又要增开邮班，經過老同事的



要求，总算又回到局里去了。可是我已不再是长期差，而降为储备差了，跑一个月邮班，只能拿二十天的工钱。一九四〇年过罢春节，邮局需增开尉氏至开封的邮班，我才被改为邮差，調往尉氏。从这时一直到日本投降，我又先后被調到洧川、新郑、禹县和信阳。这几年，我在日本鬼子、国民党军队、土匪混战的局面下跑班，不管是白天或黑夜，头顶上总有嗖嗖的子弹，路上总有敌人的关卡搜查、盘問。曾經两次被日本鬼子抓去，遭到毒打，险些送了性命。

自己受苦受难，家属也跟着遭了殃。初到尉氏不久，我第一个男孩玉順泻肚发烧，自己沒钱看，邮局里更不管家属們的死活，几天工夫，眼看着孩子死了。一九四二年初，調至新郑又是这样。有一天，我跑班途中，在南二十里鋪被日本鬼子抓住了，将近一个月的时间，才沿途要飯跑回来，我老婆已瘦得皮包骨头了。我問：“花儿呢？”她泪水簌簌地往下淌着說：“你走后，日本鬼子打来了，局里啥也不管，家属們逃的逃，散的散。到了山沟里，钱沒钱，吃沒吃，哪有奶啊？……”可怜，我的二妮，就这样餓死了。

在邮局里，我們这些差字号的“下等人”，最被人看不起。邮路一开，刀山火海都得去；跑班在外，死活局里不管；火車一通，邮路撤銷，又得滾蛋；即便是被邮局留下，也得自备盘川，奔赴調差。在当时，我們不仅在政治上受压迫，經濟上受剝削，还要受伪局长封建家长式的統治。多少穷哥儿們都做了伪局长的家奴，跑班回来，一放下扁担，就得給他們挑水、放羊、买菜，甚至連家属也得为局长太太、小姐們，洗衣、做飯、拈鞋底。稍不順从，就得倒霉。

有一次，我出班刚回来，扁担还没放下，局长太太叫我担水，我憋着一口气說：“俺自己吃的水还是买的呢！”我没給她挑。第二天，伪局长把我調到一条道远、难走、邮件重的邮路上。不久，我腿上长滿了疮，向伪局长請假，他狠狠地罵我：“你哪里不能长疮，非长在大腿上不行？我看……是楊梅大疮吧！”我怕开除，只得忍着疼，一瘸一瘸地出了班。就这样，我先后在伪邮局干了十七年。

想起我爹的死，想起階級弟兄的死，想起我那玉順、花儿的死，我就禁不住咬牙切齿地痛恨旧社会，痛恨旧制度，痛恨那些杀人不見血的統治階級。

烏云遮不住太阳。一九四八年十月，郑州解放了，我們这些差字号的穷哥儿們，挺起了胸膛，成了国家的主人。政治上不再受欺压，經濟上不再受剝削，劳动条件不断改善，生活水平逐步提高。一九五五年我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一九五八年又被提拔为包裹班班长。我的大女儿已經出嫁，两个小孩子也都上了学，日子过得挺舒坦。

好日子是来之不易啊！我們千万不要忘記过去。

（任志杰整理 金伯年插图）

血泪斑斑忆当年

許昌公路運輸公司工人 邢上榮

解放前，我家祖宗三代都受地主、資本家的剝削和壓迫。我爺那一輩，全家四口人，只有兩畝老墳地、一間破草房。生活顧不住，我爺就給地主張德興扛長工。起五更，搭黃昏，累得腰疼腿酸，還是顧不住家。沒辦法，奶奶就給地主家彈花、做針綫，換來斗兒八升粗糧，貼補着過日子。

有一次，奶奶正在彈花，我爹一不小心，把花燒着了。奶奶拼命地撲火救花，不幸被燒得皮開肉爛。由於沒錢治療，眼睜睜地看着她死去了。

奶奶死后，沒錢埋葬，就托人向地主借債。那年頭，借債也不自由呀！地主說借多少就只能借多少，少了不借。萬般無奈，爺硬着頭皮借了二十塊大洋。講明月利三分，在月一期，到期不還，本利加番。全家人糠菜都吃不飽，哪有錢還債。一年沒還上，連本帶利就算了一百五十二元。地主一

天到晚逼着要債，沒有办法，只有把兩畝老坟地、一間破草房折价抵了債。

家里再也沒法住了，爷爷就領着爹和姑姑，离乡背井，四处討飯。那时，我爹九岁，姑姑只有七岁，爷爷想着，討飯总不是长法，就忍痛把姑姑卖給人家当童养媳，把爹爹送到瞎子堂里牵瞎子。我爷爷拿着卖姑姑的錢，托人說合，給南阳市大地主謝六少家当了伙夫。

我爷和我爹，忍饥受饿干了几年，积蓄了几个血汗錢。爷爷不想叫爹牵瞎子了，想叫爹学点手艺，因此，就花錢托人，把我爹送到一家銅匠鋪里当学徒。整整学了十二年，总算学到了一点手艺。这时，我爷爷的东家謝六少，看見人家开銅匠鋪賺錢，紅了眼，就和我爹商量，他拿錢，叫我爹照顧着干，合伙做生意。可是干了好几年，最后一算賬，七折八扣，連本带利还不够东家的，謝六少逼着我爹还他的本錢，我爹几乎气疯了。

一张卖身契

一九三五年，我才十五岁。那年，南阳一带鬧了灾荒，因为家里生活无着，整天跟着媽討飯吃。一天討飯回来，爹和媽商量說：“把土荣送到南阳魯家大油坊里学点手艺，你看中不中？”“学手艺是中，就是孩子太小啦！端人家的碗，就得屬人家管，去了就得受症。”媽怕我受罪，不想让我去。

“受点症能学点手艺，长大了总比掂棍打狗討飯强。”爹說罢长出了一口气。

最后，媽也同意送我到魯家去学手艺。說是学手艺，其实是給老板当奴隶。一天，爹領着我去魯家油坊上工，那魯老板瞪着眼明知故問地說：“你們是来干什么的？”我爹說：“不是說好了嗎？今天孩子来上工。”

“上工！世界上哪有这么容易的事，文契沒有写，指押沒划，就能来上工了嗎？”这个老家伙恶言恶語地对着我爹說。

当时，我爹沒有說話，只是点了点头，咽了口气，給我使了个眼色，我扛着鋪盖卷，父子俩拖着沉重的步子离开了魯家大院。回到家，爹請銅匠鋪老掌柜作了保，写了一张文契。契上写着：“……那土荣进魯子高先生的油坊，在四年学徒期間，第一，不准回家和逃跑；第二，光管飯不給錢；第三，人死了魯家概不負責。”文契后边是保人的姓名和爹的指印。就这样，我进了魯家油坊。

进到魯家油坊，魯老板不叫我学技术，整天叫我扫地、抹桌子、抱孩子、倒便壺，尽干些杂七杂八的活。有一天，老掌柜想吃油烙饅，掌柜婆叫我烧火，因火苗太大，把烙饅給烧糊了，掌柜婆二话沒說，就拿着鏟鍋刀朝我头上打，打得我順脸流血。我逃出廚房，正碰上老掌柜，一見我，他就气势汹汹地

走到我跟前說：“怎么啦？”我还没有开口，掌柜婆一蹦大高地赶来



了，她添油加醋地說了一遍，老掌柜板着鉄青的脸，猛一脚把我踢倒在地，嘴里还罵着：“滾，我不白养活你这飯桶！”就这样，我便离开了魯家油坊。我在魯家干了两年多，沒学到一点技术，沒掙到一分錢。

二次学艺

从魯家油坊回来后，爹又托人把我送到一家銅匠鋪当学徒。进了銅匠鋪，白天化銅、砸炭、抱孩子，晚上打錘打到半夜，每天晚上四两油，熬不完不准睡觉，灯头挂到脸面前，有时打瞌睡把头发都烧焦了。就这样，还是学不到技术。一天，张文选老师傅对我說：“土荣，要想学点手艺，就得眼勤手快。”张师傅的話，我牢記在心里。每天干活时，我就目不轉睛地看着师傅怎样操作。有时，我做完了分給我的活，就跑到师傅跟前帮忙。一次，我拉罢风箱，汗都沒顾得擦，就跑到张师傅跟前学手艺。张师傅看見了，便鼓励我說：“土荣，照你这样的学法，要不了四年就出师啦！”我听了高兴地笑起来。不料俺师徒俩这一番話全被老掌柜在一旁听見了。他走到我跟前大声斥責說：“你不干你的活，到这儿干啥？”我說：“銅化完了，炉子里的火灭了，用不着我拉风箱，到这儿多干点活不好嗎？”我这样一說，老掌柜以为是頂撞了他，便瞪着两眼說：“不拉风箱，給我砸炭去！不准在这里碍老师傅的事。”他說罢用眼斜了斜我，又冷笑着說：“哼！汗还没有流够，就想出师哩，哭的不痛，想的倒怪美。”

晚上，老掌柜坐在太师椅上，嘴里叨着烟，皮笑肉不笑

地對我說：“土榮，你身材瘦小，拉大風箱頂不住，換個工吧！明天你不要去前院拉風箱了，在里院打掃地，領個孩子，干點輕活吧。”我一听就知道黃鼠狼給雞拜年，沒安好心，便說：“我是來學手藝的呀！……”我的話還沒有說完，老家伙就插嘴說：“甯迷啦，我是為你的身體着想，以後長大了，有你學手藝的時候！”為了一碗飯，我默認了。一次，掌櫃婆叫我抱小孩，小孩哭了几聲，她硬說我打了她的小孩，不容分說，拉着我又打又罵，又掐又榨，就這還不解她的恨，最後她用兩手撕着我的嘴，把我撕得順嘴流血。我一招架，她便一屁股坐在地上哭着喊叫，說我打她。老掌櫃听見了，也趕來拿一根木棍攆着打我。正在干活的師傅、師兄們听見了，都跑過來解勸。為了支持我，整整鬧了一天沒上工。這一場風波過去不久，老掌櫃便以生意賠錢為名，把我解雇了。就這樣，又在銅匠鋪白白干了兩年，沒落一文錢。

出了狼窩又進虎口

為了學點手藝，也為了生活，從銅匠鋪回家不久，爹又托人作保把我送到南陽市姜文清汽車行學開汽車。我想，這一回可該好好學點技術了。誰知出了狼窩，又進了虎口。

到了姜家汽車行，開始照舊是讓我掃地、買米面、抱孩子、提便壺，終日干些亂七八糟的雜活。干了一年多，老板才讓我去停車場做活。我想，只要叫我去停車場，一定能學會點手藝。可是，事實並不像我想的那樣。到了車場，每天除了給輪胎打氣，就是抬鋼板、裝車、卸車，光叫干些出力

的重活，还是不能学到技术。就这，恶毒的资本家还百般地坑害我，不把我当人看待。一天中午，我脱个光脊背，给轮胎打气，姜老板提了一个大罐子，悄悄地走到我的背后，右手拿着竹竿往硫酸罐里一蘸，就往我背上抹，顷刻我的脊背上起了密密麻麻的血燎泡，疼得像刀割一样，坐也坐不住，站也站不稳，在院里来回哭叫着。那豺狼般的姜老板，看见我脊背上起了泡，却仰着脸笑着说：“嘻，这硫酸还不错哩！”说罢，扬长而去。老板为了试验硫酸好坏，把我的身子当成了试验品。我脊背上的燎泡，慢慢地成了脓疮，还生了蛆，幸好聶国祥老师傅和几个师兄给我拼凑了一些钱，才治好了疮。

疮治好以后，聶国祥老师傅看我学习技术的劲大，便和姜老板商量，让我跟他的车当助手。老板不同意，聶师傅便顶着说：“我年纪大了，不给我配助手，我到别的地方开车去！”老板知道聶师傅的技术高，不愿叫他走，只好答应聶师傅的要求。

跟车当助手，按说出车时应该坐在副驾驶座里跟着师傅学技术，可恶的资本家为了多赚钱，把副驾驶的座位当作上等座位卖了票，每次出车，不管是夏天，或是数九的隆冬，我都得站在外面的叶子板上，顶着风雨过日子。有一次，从南阳运货去西安，路经秦岭，那里山高路窄，我站在叶子板



上，路两旁的荆棘把手和脸都挂破了，鲜血顺脸往下流。聶师傅看见了，便把車停下来，因为山坡太陡，刚停住，汽車便自动溜了坡，汽車碰在石头上，机器也碰坏了。

八天后，太阳快落山的时候，我們才把损坏的汽車拖到汽車行。

老板为了多挣錢，非讓我們当天晚上把車修好不可，聶师傅只好躺在車底下修，我在車前配合搖車发动，那个似懂非懂的姜老板坐在駕駛室里去摘排档。不料，我一搖車老板一摘排档，由于沒有地沟，車是停在慢下坡处修的，汽車自动溜坡了，我急忙搶步过去，想扭轉当时那危险的局面，可是已經来不及了，輪胎从聶师傅的肚子上軋过去，立时鮮血滿地。看着惨死的聶师傅的尸体，想着聶师傅生前对我的情誼，眼泪扑达扑达流了出来。我正要和老板讲理，不料那可恶的姜老板却先发制人，說是我把人軋死了。不容我分辯，就用繩子把我吊起来。一根粗麻繩，一盆凉水，用繩子蘸凉水抽打我。打一陣，問我一声，逼着說是我把人軋死的，直打得我死去活来。深夜，我已被打得不省人事，几个开汽車的老师傅偷偷地走过来給我解开繩子。趁着黑夜无人，我逃出了虎口。

苦尽甜来

一九四八年南阳解放了。我这个受尽折磨的学徒工，重見了天日。在旧社会里我干了十四年徒工，学到了什么呢？除了挨打挨罵，什么也沒有学到。南阳解放后，我爹被分配到南阳商业局工作，南阳市总工会将我送到工人訓練班学

习，结业后又把我送到工厂学技术。一九五四年調我到許昌公路运输公司。在党的培养和老师傅的耐心教导下，我很快地提高了政治觉悟和技术水平，也摘了文盲帽子。現在我已 是六級技术工人了，組織上帮助我成了家，一家人过得快快活活。

想想过去，看看現在，一个是“地獄”，一个是“天堂”。旧社会当学徒，不但不能学技术，而且随时都有死掉的可能。解放后的時間虽然不长，可是我在生活上、技术上变化多大啊！这幸福是党、是毛主席給的。我一定要好好工作，来报答党和毛主席的恩情。

（张仲立整理 徐秀英、傅凌云插图）

三代春秋两个天

中共新蔡县搬运站支部书记 赵文德

我每逢出車上路，一遇到戴紅領巾的少先隊員，心里就特別激動。這些孩子生長在新社會是多麼幸福啊！回想我像他們這麼大年齡時，已陷入了人間“地獄”。在黑暗的舊社會里，我整整熬了四十個年頭。逃過荒、要過飯、放過豬、當過童工、當過搬運工人，受盡了地主、資本家、封建把頭的殘酷壓迫和剝削。這些刻骨的階級仇恨，是我永遠不能忘記的。

兩代的苦難

我八歲那年，春季鬧水災，夏糧顆粒未收，爹無可奈何地到地主王西恩家高利借了一斗糧。一斗糧應該是四十八斤，但是狠心的地主，大斗進，小斗出，說是一斗，實際只

有三十来斤。全家五口人，就凭这点粮食，掺糠掺菜挨到秋收。眼看着要收谷子啦，媽布滿皺紋的脸上，露出了微笑，她高兴地說：“孩子，打下谷子，我一定做一頓干飯給你吃。”誰知就在秋季剛打完場的時候，地主帶着三個狗腿子，拿着算盤和布袋來要賬了。地主王西恩開口就說：“今年夏租未收，秋季租子加上借糧本利，一共二百五十斤！”我家秋收的糧食總共只有二百斤，爹說了許多好話，地主根本不聽，就命令狗腿子把兩袋谷子全部背走，還說：“下欠五十斤，明年再補。”一年的心血又完了，媽實在按不住心頭怒火，拼命地撲上去爭奪，被狗腿子一脚踢倒地上。我氣極了，拿着扁担就去趕，被幾個大叔、大嬸拉住了。媽這一氣臥床不起，沒多天，就去世了。從這，全家人含着眼淚離開了老家——杞縣，出外逃荒了。

我十四歲那年，跟爹逃荒到了徐州，爹給一家外號叫“二閻王”的地主扛活，我給他家放豬。一次，一個小豬病了，“二閻王”提着棍找我說：“豬好不了我打斷你的腿，要不，扣你爹的工錢。”以後，小豬死了，爹的工錢被扣得光光的。我們父子倆給他賣了一年命，結果落得兩手空空。

臘月，當“二閻王”家正在大宰豬羊，準備過年的時候，爹和我披着麻包片，冒着大雪，沿着米甯的老路往回乞討。誰知到了老家，可憐的奶奶早已餓死，小姑當童養媳走了。

根根火柴血泪染

第二年，我又跟着爹第三次出門逃荒要飯。到了開封，

爹会点木工手艺，一心想到火柴厂当工人。据说这家火柴厂是河南省督軍开设的，他很有一套吸吮工人血汗的办法。他用低薪招收童工，只要有铺保就可以进厂。爹和我在那里举目无亲，要了俩月饭，才算遇到了一个做生意的老乡，请他写了铺保。资本家只要我，不要我爹，经苦苦请求，才答应照童工待遇，让我爹也在火柴厂干活。

入厂后，俺爷俩干一天，只能落上斤把小米，吃不饱只有勒紧腰带加班加点，每天至少干十二个小时。有时甚至干上十五六个小时。爹这些年来忍辱挨饿，已被折磨得面黄肌瘦，怎能经得起这样繁重的劳动呢！有一次，夜晚加班，爹实在支持不住了，刚想打瞌睡，被那在白天喝足酒、睡足觉的工头发现了，竟用皮鞭狠狠地抽打了一顿。爹被打得一连十几天不能起床。就这样，把头还威胁我说：“哼，你爹好大胆，竟敢违犯厂规，一连十几天不上班，不想干就早点说话。”后来，还是工人弟兄们伸出了阶级友爱的手，有的拿出几个铜板，有的送点米面，让我爹休养治病。有个工人拍着我的肩膀说：“谁都知道毒蛇狠，可资本家比毒蛇更狠，大伯的病再厉害，他们也不会发什么善心。我们要生存就必须斗争，绝不能跪下来求生！到月底咱们一道去找把头借钱，人多他就怕我们。”到月底我和大哥、大姐们一齐去借钱，到那里果真挤了满屋借钱的工人，工头要尽所有骗人的花招后，才不得不答应提前借支十天的工资。

当时我心中盘算着，在这里虽说受苦受难，可是，有这么多好心肠的工人弟兄，不管好坏，只要三年熬过去，等出师以后，情况可能会好些。哪晓得左盼右盼，竟是一场空。该出师时，又遭到意外的灾难。到第三年腊月，资本家眼看

着大批童工就要出师，已没有什么油水可榨了，就搞了个骗局，工头向工人们说：“年关是火柴的旺季，你们都学得了本领，大家赶一赶，做一箱火柴给两箱的钱，督军年底亲自来发赏。”

夜里，外面是呼啸的北风，卷着鹅毛大雪，草棚里是穿着单衣的童工，在钉火柴箱子。工头穿着狐皮袄，手里提着棍，瞪着眼，谁钉弯一个钉子就是一棍。我红肿的双手，握着冰滑的铁锤，每一锤都是小心翼翼地往下落，生怕砸弯钉。忽然从棚外吹来一股冷风，卷着锯末迷住了我的眼睛，一锤把食指砸伤了，鲜红的血顺着火柴箱往下淌着。工头一看血染了火柴箱，便凶恶地扬起棍说：“这是年货，血染了咋出厂？扣你们的工钱也顶不上一箱火柴！”在我对面的一个工人，忙拿起刨子对工头说：“他的手砸伤了，这血我给刨掉好了。”他刨完了血迹，又帮我钉完最后一箱火柴。夜深了，北风把草棚吹得瑟瑟作响，我们这些可怜的孩子，身子贴着身子，缩在锯末堆里，含着眼泪等待着天明——年三十，督军前来发赏。



天刚发亮，院子里的人群骚动起来了。我们一看，火柴全拉走了。有人说：“工头那狗娘养的携款溜了。”工人们一哄打烂了工头窗上的玻璃，烧掉了账本和卖身契，我用疼痛的手握着棍戳破了墙上督军的纸像。有个工人

站在高处說：“工头騙人跑了，我們到督軍府找督軍去。”人群像潮水一样，直向督軍府奔去。工人們在路上愤怒地喊着：

入厂难，入厂难，
請客找保又拿錢，
五更起，半夜眠，
肚子不飽肉瘦干。
把头狠，手遮天，
根根火柴血泪染；
血吸尽，腰包滿，
工头携款滾了蛋。

督軍府那黑黝黝的鉄扇大門，早已上了鎖，工人們把它围得水泄不通。到天黑，一群荷枪实弹的卫兵在門里出現了，一个領头的冷冷地說：“督軍还未到，就是到了与火柴厂也一概无关，你們还等什么？”大家看着沒有希望了，才憤憤地离开了鉄扇門。

就这样，我和爹三年的血汗又算白流了。

搬运工的血泪仇

从工厂出来以后，爹和我又只好过起討飯的生活。有一次，我們到破庙里避雨，一进門，就听见神台侧面传出一陣陣无力的凄惨的哭叫声。我壮了壮胆子往前走去，只見一个蓬头垢面的姑娘，正扑在一个死人身上痛哭。这个可怜的姑娘，原来也是因地主逼債逃出来的。我們帮助她埋葬了母亲，就和她一起要飯为生，后来俺們就結成了患难夫妻。

一九三二年，我們一同逃到了新蔡，这里城南城北洪河、汝河两个碼頭开着两个脚行。当时，我一心想入行，一打听，入行得先給把头請客、送礼，像我这样一个上无片瓦，下无立錐之地的人，哪有錢請客送礼，后来只好給別人帮脚，得来的錢对半开。分的錢不够养家，有时一連几天揭不开鍋。

到新蔡十来年，我爹和我的两个孩子全餓死了，还未能加入脚行。直到資本家需要更多的人給他卖命时，我借了点錢，买了几条烟送給他們，这才叫我入了行。初入行，干活多拿錢少，每装一次貨把头就得扣一次茶錢，稍有得罪，就叫停車，停了車还得請客送礼才叫干。另外，逢年过节，工人们得合伙請把头下館子大吃一頓。算来算去，掙来的錢，經過凶狠的把头层层盘剝，工人得到的錢就廖廖无几了。有一次，工人田永德家中揭不开鍋，向把头借支，他不給，气的老田說：“拼死比餓死强。”正在这时，把头来到眼前，他抓住把头就打，喝醉酒的把头剛想伸手掌耍威风，我和旁边的工人一股压在心头的怒火頓時燃燒起来。我一把抓住他的衣領，工人们順势狠狠地揍了他一頓，只打得他抱头从人群縫里溜跑了。



春雷响 乌云散

解放的炮声，像春雷一样驱散了头上的乌云，灿烂的阳光照亮了洪河、汝河两岸这一望无际的平原。新蔡县解放了，我们这些从“地狱”里挣扎出来的脚夫，在党的领导下，斗倒了封建把头，变成了真正的人。现在再也听不见人家叫我们脚夫、推脚的，而喊我们搬运工人、工人同志了。以后，成立了工会，我被选为工会委员。像我这样在旧社会被侮辱、被蹂躏，牛马不如的奴隶，翻身成为国家的主人，真是做梦也没想到。

一九五一年，我当选了搬运站站长，一九五二年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共产党，当选了县人民代表，多次被评为劳动模范。这些荣誉太大，我所作的工作太少，我恨不得把我的身心一下子拿出来献给党。

一代更比一代强

解放后，我家的生活一步一步地好起来。我儿子锁和侄儿军一齐从初中毕业了，他俩都抱着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理想，参加了搬运站的工作。当时我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，用双手拍着他俩的肩膀说：“你弟兄俩年轻又有文化，前途可大啦，今后的建设全靠着你们这一代啦。我现在年龄虽然大了，不过下下力气拉车上路，再干几年也不成问题。”孩子们抢着说：“我们回来了，你不用再拉车啦，明天就分给我们车吧。”我说：“下路拉车可得要有力气，你俩先在站里

干点輕活吧。”鎖說：“我倆一毕业就下定决心像你一样当个搬运工人，为社会主义搬砖运瓦。”第二天，他們两个拉着嶄新的架子車和我一同下路了。

去年春节，鎖結婚了，結婚时还添了些东西，我說：“鎖呀！你托毛主席的福，比我和你媽結婚时可强上千倍啦！你应该記着：你是在苦水里生，甜水里长起来的人，可不能忘本啊！”

去年夏天，是两个孩子初中毕业的第三个年头了，虽然天气炎热，他两个还是照常出車下路，拉起裝滿貨的車子，总是跑在人們前面。

我的小女是少先隊員，在她入队那天，我亲自給她戴上紅領巾。当时我激动得流下热泪，我說：“小丫头真有福，共产党給你撫育这么大，可沒尝到过一点辛酸。常言說，不受腊月寒，哪知六月暖，今日的幸褔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也不是从地下长起来的，这是革命前輩用鮮血换来的，今后要永远跟着共产党走，做毛主席的好孩子。”

打心眼里說，我觉得越活越年輕，拉車劲头也大了，掄起麻袋也輕了，路越走越寬，方向越来越明。所以十四年来如一日，我一直同工人一起劳动，跟班出車。我爱搬運站，更爱我們的車，我觉得一时一刻也离不了它。

（中共新蔡县委宣传部整理 徐秀英、吳懋祥插图）

“二七”罢工后的日日夜夜

郑州铁路局車輛南段退休老工人 刘 桐

我是北京宛平县人，离北京城六十里。几辈子都是房无一间，地无一分。父亲是个铜匠，一年四季挑着小担儿，四出游乡找活做。我十四岁那年，父亲和母亲染上伤寒病，因为无钱医治，相继下世了。

父母死后，我无家可归，就流落到北京一家饭店里当学徒。熬了三年，学徒期满。那时行业的规矩，期满得办谢师酒，才能当厨师。名说谢师，事实上一些资格老的厨师都要来喝酒吃饭，人数有几十个，一算要五十多块钱。我当学徒时，资本家只管饭，不给工钱，哪里有那么多的钱呢！不办谢师酒，还得当学徒受欺凌。我忍受不了，就偷跑出来搭荒车到了彰德府（现在的安阳），也找不到合适的工作，没办法又在一家旅馆里当学徒。这碗饭同样不容易吃。契约上写着“打伤病死，投河上吊，与店方无关。”除了给资本家当奴

隶，还得受有钱顾客的打骂。我熬不下去了，就又跑到郾城县作了铁路上的抬煤夫。抬煤夫的苦难更重。每天得干十六小时的活，工头在一旁掂着棍子，逼着工人快步往又高又陡的煤台上抬煤。每天累得腰痛腿酸，稍有一会空，一坐下就睡着。要是工头瞧见了，不是打骂，就是罚钱。工钱本来很少，一罚钱，所得就更少了。每天晚上下班还得找睡觉的地方，一年四季睡墙旮旯，不少人染上了风湿症和伤寒病。要是工头发现谁干活走得慢，就指名开除。一九二〇年，我又到京汉铁路郑州大厂当了杂工。在大厂除了受工头、总管的气外，还受外国人的欺侮，日子更不好过。

这时厂里虽说每月给几块工资，可是常常三个月五个月不开支。妻子和小孩挽着篮子去拾煤核，拾来后卖了，买些黄面，煮些糊涂，可是他们自己还舍不得吃，留着让我吃。所以工人下班后，也不敢回家，大家就只好到老坟岗茶馆去闲坐。



办起了俱乐部

一天傍晚，我们几个工人正在茶馆里喝闷茶，过来一个穿长袍的青年人，听我们谈苦闷话儿。瞅个茬口，他就跟我们搭讪了几句。后来我们觉

得他的話儿怪对口味，就聊了起来。他說：“你們每日愁眉苦臉，也該长长精神么！”我們說：“整日愁吃愁穿的，誰还有心思。”他笑了笑，說：“光发愁就有吃穿了嗎？”我們一听这話在理，就問：“怎样长精神法？”他扳着手指头說：“一不进妓女院，二不进賭場，三不去酒館子。”我們还解不开，問：“去哪儿长精神呀？”他輕声細語地說：“搞个組織不行嗎？”他看我們都沒敢吭声，就說：“人家长辛店鐵路工人都有了。人家的組織叫俱樂部，是工人自己办起来的。”我們又問：“都有哪些好处呀？”他說：“一能联络工人感情，增強团結；二能学习文化技术，增长知識本領；三能給工人謀福利，改善生活，提高地位。好处大着呢。”听他这么一說，我們心里好像閃开了一道亮光。因为他經常跟我們在一块讲，所以要組織俱樂部的事就在工人中传开了。

不久，由厂里木匠张仁寿出面，串通一部分工人，就办起了俱樂部。这时我們才知道那位青年人是劳动組合書記部派来的。

京汉鐵路总工会成立了

在党的领导下，到一九二二年，京汉鐵路沿綫已經成立了十六个工会。当时为了进一步壮大工人的力量，决定在郑州成立总工会。日子定在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。沿綫工人热烈响应。汉口和长辛店等地工人，在元月底就帶着匾和其他礼物乘专車到了郑州。郑州的工人为了防止敌人破坏，組織了糾察队，敲鑼打鼓到車站迎接南北来的代表。車站上的响



鞭挂有二里多长，各地送的大匾、小匾、对联、江西瓷碗等各种礼物，由工人抬着排成队，前去普乐园开会。气势十分雄壮，显示了工人阶级的威风。

当时大军阀吴佩孚，命令他的爪牙狗腿，荷枪实弹沿街排列，不许我们工人开会。可是我们工人满腔热血，为争人权连命都可以泼上，谁还理会那些军阀走狗的威吓！我们工人代表的队伍走到钱塘里时，就与截路的军阀走狗发生了冲突。我们先是据理力争，后来，大家看出敌人是不会跟我们讲道理的，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迎着敌人的刺刀，像怒潮一样地直闯进普乐园，唱着《国际歌》，齐声高呼：“打倒封建军阀！”“京汉铁路

总工会万岁！”等口号，京汉铁路总工会在雄壮的歌声中成立了。

这时，敌人已在普乐园四周架上了机关枪，妄想吓倒工人。工人代表和纠察队一起，勇敢地越过敌人的机关枪，冲

出會場，繼續在街上游行。敵人又進一步對我們進行迫害：封鎖了工會辦公地方，勒令各旅店、飯館不准接待各地的工人代表。我們一方面依靠群眾解決外地代表的食宿問題，一方面連夜秘密舉行會議，向鐵路當局提出抗議，並表示不撤換偽局長趙繼賢、偽副局長馮濤、鄭州市偽警察局長黃殿辰，我們工人決不復工。

我們選派了五位工人代表，直接上洛陽找吳佩孚交涉，誰知反動派却逮捕了我們的代表。漢口等地的反動派也下了毒手。這就更激起工人的怒火，於是爆發了震驚全國的“二七”大罷工。罷工鬥爭遭到了吳佩孚的血腥鎮壓，林祥謙、施洋等烈士英勇地犧牲在敵人的屠刀下。但這沒有吓倒我們。

罷工鬥爭在繼續進行，敵人復工陰謀沒有達到，就又施出另一套手段。他們收買工賊、走狗，虛張聲勢，到處威脅誘騙工人，企圖瓦解我們工人的鬥志。當我們工人秘密巡查時，發現大廠里有叮叮當當的响声，煙囪也冒出了縷縷黑煙。我們幾個人就設法進廠了解真相。原來是工賊張世榮、唐大嘴在陰謀搞假復工，敲砧子和敲鋼軌頭的淨是些出高價雇來的地痞流氓。我正要把他們的名字和罪行記在小本子上，準備向工會匯報，進一步跟工賊算賬，不料張世榮瞧見了我們，那小子以為我們是被誘騙復工來了，張口就罵：“不快些復工，還迷瞪什麼？”我忍住怒火沒答理他，他的狗尾巴就翹起來了，洋洋得意地恐吓說：“劉桐，趁早告訴工人，要是誰不復工，就甭想跑出我們的巴掌心！”我怒沖沖地握緊拳頭警告他說：“姓張的，你先不用翹尾巴，我們工人早晚也饒不了你這只走狗。”這小子是有名的耗子

胆，他知道工人怒火烧心是不好惹的，只好又悻悻地缩回头去。

尽管敌人血腥地镇压了工人运动，但是，由于我们工人有党的教育和工会组织的领导，因而在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，锻炼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意志。

埋在心底的仇恨

当时那个工贼张世荣，是个屠杀工人的急先锋，是个头上生疮、脚底流脓，一坏到底的家伙。他原是郑州铁路大厂里机器房的大领班，因为他给赵继贤和吴佩孚出谋献策，镇压工人运动有功，便当上了吴佩孚十四师的头等副官，又兼郑州市伪警察局的督察员。这家伙，有时穿件小皮袄，两手插在袖筒里，在人群里混来混去，专找工人的岔子，想尽办法罚工人的钱。一次，一个工人饿了吃几口馍被他看见了，上去就打骂一顿，又硬逼着他把口里的馍吐出来，还罚五毛钱。当时上班摘牌子，下班挂牌子。他就在下工前把挂牌处的钟表倒拨一刻钟，让工人晚下班，上班前再重新拨回来，让工人迟到，他好罚钱。有时，他又穿上督察服和大皮鞋，头戴金箍帽，挎着东洋刀，手拿文明棍，口袋里露出银质表链，脸面朝着天，楞着一对老鼠眼，好像工人都欠他祖宗债一样。有时，他又穿着军官服，系着武装带，后边跟着护兵和马弁，腰里挎着盒子炮。这样吓唬工人还不够，他还故意把身兼三职的官衔片子，从口袋里丢掉几张，让工人拾到，知道他官高势大。罢工后，这个坏蛋更是这里打听一下情况，那里探听一下消息，一心要为主子效劳。罢工期



間，郑州分工会会长高斌等被捕，就是他搞的鬼；复工后，我和其他三十多名被开除通緝的工人，又是他提的名；后来，工人代表司文德、汪胜友被杀害，也是这个坏蛋出的主意。

一天，我刚擱下飯碗，老远就看見这个坏蛋好像吃醉了酒似的，晃晃蕩蕩的过来了。还没走到跟前，

他就哈腰鞠躬說：“刘主任，吃过飯了吧？”我一听，心里打了个顫，就知道他是找事来了。本来么，我在工会当庶务副主任他是知道的，可是，从来也没見他对哪个工友哈腰打躬的。今天，对我刘桐这样，难道不是黄鼠狼給鸡拜年嗎？他又向我走近一步，皮笑肉不笑地說：“我这个人就喜欢干脆、直爽、痛快，最好交个朋友，日子长了，你会知道的。过去咱們很少打交道，所以你不了解我，哈哈……”他往装洋蒜，我早知道他来卖什么药。他还要繼續往下說，我听不下这些混帳話，就說：“你大領班官高势大，我这个穷工人怎配和你交朋友！打开窗戶說亮話，有話快讲，有屁快放！”这个坏蛋一听，就現出原形来了。他蛮橫地說：“刘桐，你不要不識抬举。話說明白，赶快通知工人上工，否則就要对不起。”我早就忍不下去，拾起一根棍指着张世榮說：“你要是再放臭屁，老子的棍是不认人的！”这小子



見奸計不成，一邊往外走，一邊還恐嚇說：“是好漢在家等着，咱騎驢看唱本，走着瞧！”

我們忍痛复工后，反动派知道我們工人是不甘心的。張世榮給“黃狗”（鄭州市偽警察局長黃殿辰的綽號）獻策，工廠就馬上宣布開除李全德、鄭國鈞和我等三十多人。頭天開除，第二天警察局就下了捉拿我們的通緝令。揚言誰協助捉拿一人，犒賞大洋五百至一千塊。組織上看我們在鄭州呆不下去了，就悄悄地組織群眾掩護我暫時離開鄭州到了保定，一下車正愁沒處去，一台調車機跑過來了，車上有一個掛頭鈎的認得我，就扯了幾句，從口袋裏掏出幾個銅子給我說：

“你趕快走，鄭州正畫圖像捉你們。”

為了躲一下風聲，我又離開保定府到河間府去。這時，我手裏沒有一文錢。要飯吧，人生地不熟，還怕發生意外。我站在河間府北門外心緒不定，對着茫茫的田野想：“我們工人為了爭人權、爭自由，就罪該萬死？你們打罵殺害工人，不正是罪惡滔天嗎？哪裏有理啊！呸，黑暗的社会制度！我要和你干一輩子。”後來來了成群結隊趕廟會的人，為了好要口飯充飢，心一橫就暈去了。我雖然是窮工人，可是從來沒有要過飯，第一次向人伸出手可真是難啊，我就靠着一根電綫杆站着。這時，冷不防一隻手拍住我的肩頭。我心想，一定是哪個反动派知道我來這兒了！我鎮靜地站着，不扭頭。那個人看我沒理他，就轉到我臉前。哦，原來是個滿臉胡楂的老頭。我一時惶惑了。他就問：“劉師傅，你不認識我了？我是被你們工人救活的呀。”一句話點破，我跳出了悶鼓，全都想起來了。先前我們在鄭州籌辦工會時，這老漢在鄭州要飯，就住在我們俱樂部旁的一個破小棚里。每

逢刮风下雨天我常給他几个錢买飯充饥。初冬时节，他又患上了伤寒病，一身襤褸卷縮在那里。在死亡的边缘上，是我們几个工人給他請医生治好的。想不到我們又在这里見面了。

我在这个穷朋友家住了两个来月，心里惦念着一起鬧斗争的穷哥們，为了繼續办工会鬧革命，为“二七”死难烈士报仇，我又暗地里回到了郑州。在工人弟兄家隱藏的日子里，他們一方面給我生活上很多帮助，一方面帮助我了解到很多情况。組織上把我們掩护走以后，仍然有不少阶级弟兄遭到敌人的残酷迫害，有的坐了牢，有的遭到开除。敌人在工厂里安插了警察便衣，扶植工賊走狗，来監視工人。还抄了我們被通緝工人的家。敌人因为几次深夜去家沒有捉到我，就用各种手段威逼我的妻子，要她說出我的下落。敌人的威胁沒有达到目的，就把她和孩子赶出家門，逼使他們过着流浪乞討的生活。

敌人的这些血腥罪行，在我心里燃起了烈火般的阶级仇恨。“二七”罢工时工会秘书长的話又响在我的耳边：“帝国主义和封建軍閥，残杀我們工人，这种冤仇我們怎能忍？不报仇枉为世上人！”我正在四处打听鬧斗争的工人时，大厂里一个姓周的便衣警察发现了我的行踪。这小子长着一副猪八戒脸，露着两个大門牙，外号周大牙，是京汉铁路伪警务总段长“胡扒皮”（胡鴻章的綽号）說一不二的紅人，又是郑州伪警察局长黄殿辰的便衣特务。罢工以后，胡扒皮便阴谋把他安插在厂里作奸細。这家伙成了插在我們中間的一把刀子。他张嘴合嘴說：“姓周的也要拿几个‘好朋友’，换个金箍帽和东洋刀抖抖。”所以，便处处带头逮捕鬧成立工

会的积极分子。如今这小子突然发觉我的影子，认为是他升官发财的良机，便鬼鬼祟祟地猫着腰去临近报告。我心中有数，等他密报警察局来捕我时，我已在附近工人家中隐藏起来了。

坚 持 下 去

当时我们的处境越来越艰难，但我相信，我们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一定会胜利。我仍旧到处联络工人。一天，我在一条小巷里碰到了京汉大厂铆工刘茂友同志，他在罢工时参加过纠察队，我正想和他谈谈恢复工会的问题，周大牙又赶来了。我一闪躲了过去。周大牙向老刘查问我的去向，我明明朝北走了，他却说我朝南走了，让我有足够时间躲开敌人的跟踪。

过了不久，听说有些工人弟兄坐牢回来了，我就想找他们，讨论继续斗争的问题。一天，我在老坟岗正走着，忽然听到背后连声轻喊：“老刘，老刘！”我就警惕地扭头寻视。原来是李全德呀。偶然见到一个受难的弟兄，觉得分外亲切。他是在北京坐牢刚回来，没有出路，便到老坟岗帮一位本家轧面条混顿饭吃。有了可以说真心话的人，我便想了解一下风声。就问：“我们能露面吗？”他说：“风声小些了，等些时可以回家看看。”我说：“回家是小事，咱还得把工会办起来呀！”正说着，我的疟疾发作了，浑身直打哆嗦。李全德就找一领破席让我躺下，又把他的破棉袄脱下盖在我身上。寒冷饥渴，把我折腾得头晕眼花。李全德给我几个铜子，买了个饅和一碗丸子汤，流浪这么多天，头一次痛

痛快地吃了一頓飽飯。

李全德老家是离郑州二十里地的老鴉陈，他邀我暫時住到他家。到那里有七八天，我得了風濕病，左胳膊左腿都抽筋，骨痛肉腫，寸步難行，躺在草上，靠李全德送点飯充飢。他家四口人，吃這頓沒下頓，我再牽累他，他家生活更沒法了。后来，在村上一个长工的帮助下，我又暫時搬到村里的一座破庙里去住。

李全德因事出外了，他委托农民弟兄照应我。

我的处境打动了許多农民的心，他們把身上的衣服脫下来，让我穿上御寒；他們每天帶着笑送飯到我脸前；他們关心我的病体，話語里帶着溫暖。夜晚，他們又送来干草，让我取暖。有一位长工，怕我在破庙里过夜太冷，每晚都扶我到他牲口棚草堆里睡觉。就这样，在农民弟兄的热心帮助下，我的胳膊和腿逐渐消肿，自己可以湊合着走路了。

貧苦农民对我的溫暖，更鼓舞了我的斗志，我想，总有一天，我們的苦水会汇成大海，我們的血泪要聚成汪洋，必定要冲垮鎖鏈，淹沒反动派的宮殿！

过了一段时间，李全德回来了，我們商量着要去城里看看风声，打听打听情况，看看下一步該怎样斗争。那一天阴云密布，冷风吹飘着毛毛雨。我刚进市区，就听见在东南方传出鬧嚷嚷的人声，不禁心里惶惑起来，我警惕地朝着那个方向走去。老远就看见长春桥头（现在的二七广场）密密层层站着很多人。等我走近时，人們都正在离开。我就靠着一根电綫杆站住，看出了什么事情。我注視一会儿，发现人們不断望我附近那根电綫杆。我抬头一看，啊呀！那不是挂着两个人头在“示众”嗎？随即眨眨眼睛辨認，正是工务段工

人总代表司文德和工会委员长汪胜友。敌人又欠下一笔血债，望着这一切，使我流下了怒愤的眼泪。

后来反动派知道了李全德和我的下落，周大牙带了便衣来捉我们了。那个长工就把我引到牲口棚，叫我躺进喂牲口的石槽里，身上盖满草，又把牲口身上的缰绳勒紧，让牲口在槽边站着。周大牙怀疑我在里面，站在门外不走。那个长工打量只有一两个人，伸手提把大粪叉出去了，厉声问道：

“你要找谁？”那小子带理不理地说：“我要找姓刘的。”那长工膀大腰圆，一挥大粪叉，怒狠狠地答道：“我就姓刘，找我干什么？”那小子一看风头不对，连说：“不，不，不是你……”拔腿就窜了。

找铁道大队

就在这时我听到一个口信，说北伐军打到武胜关一带了，不少办工会的工人都在北伐军的铁道大队里工作，就一心要奔铁道大队。贫苦农民听说我要走，有的给我送来了破棉衣，有的送来了破棉鞋，有的送来几个馍。最后，他们还想到我在路上要用钱，又凑了一些钱送给我。在我半夜离开那里的时候，许多往事交集心头，我和那些善良忠厚的农民弟兄多么难分难舍啊！一步一回头，眼睛里噙满了泪水……

由于路上走得太快，到郑州我的腿又肿了。我想找工人帮助我搭车南下，见隴海花园树木繁密，便于隐蔽，我就蹲在里面。直等了一大晌，我正愁找不到一个知心人，忽然近处传来了脚步声，我透过缝隙一看，原来又是刘茂友同志。我赶紧往前几步喊道：“茂友！茂友！”我一露头，使他楞

了半天。他开口就说：“哎呀，你把我吓了一跳，注意工贼，他看见了要你的命。”我摆一下手势，说：“进里边，不要嚷嚷。”“你打算咋办呀？”“我往南边找铁道大队去。”这时，他已经三个月没开工资了，可是刘茂友同志还是赶回去，找穷工人弟兄凑了几串钱，又给我找了火车，帮助我南下。第二天早晨，那趟列车到汤旗外停住了，从机车上跑来两个工人，把我从树丛里轻声喊出来。一人搀扶一只胳膊把我抬上了一辆空敞车里。机车没有鸣笛，马上起劲向南开跑了。机车到和尚桥车站，开车的田大车派伙计给我送来一壶开水和两个馍。列车到漯河时，我多么想下去感谢这些阶级弟兄啊！一来腿又红肿得不能动弹，二来怕暴露目标，被敌人发觉，没有下去。换了车头，当列车继续南开时，又下起了细雨。雨淋风吹，浑身战栗，有病的胳膊和腿绞疼，弄得眼里直冒金花，列车在遂平车站吱哇停下了。一会儿，有两个烧火工人爬上我坐的车皮，开口就说：“田大车嘱咐我们照顾你。”一句话温暖了我的全身，我激动地说：“多亏弟兄们搭救我啦！”他们把我背到一个空棚车里，让我避雨遮寒。他们想得多周到啊！

大概在半夜时分，列车到驻马店不走了。我担心天明了有危险，在一个工人的帮助下忍疼下了车皮。这时，我的破棉袄湿透了，下身只穿条半截破单裤，两只露脚趾头的棉鞋也穿了底。又饿又冷，连路都走不动，好容易走出了车站围墙，看见了一间小房子露出灯光，就小心朝前走去。隔门缝一瞧，这是个水泵房，一个值夜班的老工人看去很面熟。我心一横，就推门进去了。我那模样，把他吓了一跳。他楞了几分钟，才吐出一句话：“你是办工会的老刘？”我一听

音，心里也豁地亮了，說：“你是駐馬店工会的老戴？”他一下惊喜地笑了，說：“啊呀！快坐下，人們都吵嚷你死啦。”我也高兴了，說：“叫我們死，办不到，是好汉要干到底。”他也說：“对呀！我們这里暗地还酝酿成立工会哩！”他把我身上的湿衣服脫下来放在鍋炉上烤着，叫我躺在他的被窝里睡下，又端来一盘炒豆腐和四两白酒，让我吃了一頓飽飯。随后，他又把自己一身破棉衣、棉鞋、棉帽子給我穿戴上，找一趟开往信阳的空棚車，趁天不明送我上了車。这时，他們这里也是两三个月沒开工錢了，但是，还是把他仅有的几个銅子送給了我。我們默默相視，心里都非常激动。等列車将起动时，他哽咽着說：“看，坏蛋把你逼得多惨呀！”眼泪像断了綫的珠子一样掉下来。我对他說：“是呀，我們永远忘不了这份仇恨！”不久，我就找到了鉄道大队，打回了郑州。

回郑州以后，我就上了工，和穷哥們又办起工会来。不久，蔣介石阴謀窃取了北伐革命的果实，对共产党和傾向革命的人实行大屠杀，我又一次走向了流亡乞討的生活。在这几十年的乞討生活里，我由生入死，由死还生，何止九死一生啊！在饥餓、寒冻和走投无路的时候，我就唱起了过去在斗争中学会的一首歌：

我們工人創造世界，人类食住衣；
不做工的資产階級，反把我們欺。

.....

刮我血汗作为肉，牛馬待工人，
倘若大家再推辞，不能活生命。

.....

这种冤仇这种恨，我們不該忍，
不报仇，不雪恨，枉为世上人。

.....

快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喚醒我工人，
努力呀！奋斗哇！为我阶级爭。

这一首战歌陪伴我流浪了几十年。那时一唱起来，渾身就充滿了战斗力。

我們胜利了

一九四八年十月，平地一声雷响，我終于走出了漫漫长夜，見到了太阳。是共产党和毛主席把我解放了，結束了我的流亡生活。我永远忘不了当时党派人把我找回来时的溫暖；我永远忘不了党对我们老工人无微不至的关怀；我永远忘不了党給我們和“二七”先烈們报仇雪恨——鎮压了劊子手赵继賢、张世荣；我永远忘不了党又使我在旧社会流亡失散的老婆、儿女重归团圓。我的大儿子自从要飯失散后，不久就参加了八路军，并且参加了共产党，在抗美援朝前綫光荣負伤后，轉业到了工业战綫上工作。

我已經六十八岁，去年退休后，国家发給我退休金，让我过着幸福的生活。这一切都是革命先烈抛头颅洒鮮血换来的，我一定要教育后一代，听党和毛主席的話，继承先烈遺志，兢兢业业地建設社会主义。

（楊 鵬整理 李 智插图）

誓死不屈

——記“二七”老工人李全德的斗争事迹

江 涛

軍閥手中鉄，
工人頸上血，
頸可断，
肢可裂，
奋斗的精神不消灭！
劳苦的群众們，
快起来团结！

摘自“二七”歌謠

这是三十九年以前的事。

一个魁梧的汉子，手带铐，脚带镣，由五名持枪的反动軍警解押，“当——啷，当——啷——”步履艰难地上了火車，离郑州去北京。一路上，无数旅客投来惊异目光，而带刑具者却是大义凛然，憤懣昂揚地向人們讲：

“我是京汉铁路郑州机厂的工人李全德！段长四十五天不給工人开支，我們找他要錢，就犯了王法……”

人們弄清了年青汉子的来历，看他英雄豪迈，都深表同情。

李全德——旧时代的普通无产者，为何有此遭遇？还要从他平凡的经历說起。

做 工

李全德一八九九年生，郑州人，沒有几个月，就父死母嫁，跟着白发蒼蒼的祖母吃糠咽菜长大。李全德大些了，給地主当长工，給窑主烧窑。在走投无路时，又流落到了郑州。

李全德在郑州人地两生，他跑到京汉铁路郑州机厂（現在的郑州机务南段）煤台上打小工。这活出力大，挣錢少，卸一个十五吨煤的車皮，只給三角錢，連自己的肚子也填不飽。李全德苦熬七个月，等上厂里招长期工。穷弟兄們，可怜李全德，便等不上問他，就給填了一个“李全德”的名字，替他报了名。其实，他的真名叫陈福荣。

一个寒风凛冽的上午，厂里通知报名的工人考試。衣服襤褸的穷苦人，为找一碗飯吃，列队站在几个粗重的鉄东西跟前，他們对面是吃得肥头大耳的总管和监工。

“李全德！”监工头终于喊到了这个名字。

他应声走到鉄东西跟前，双手抓住它的两端，周身一用劲，把这一二百斤重的鉄家伙放到自己肩上，朝一百米的地点走去。伪总管見李全德力大，便向一旁的监工使了个眼色，叫回李全德，說是考取了。

李全德找保上了工。名义上他是个煤台夫，一个月可以拿九元工資，实际上却是卖命。清晨六点钟，厂里一拉响“喊”，李全德就得和穷弟兄們蜂拥着上工，晚到几分钟就算一个曠工；一个曠工扣一天半的工資；七个曠工就丢了飯碗。上工干起活来，出的是牛馬气力，两人抬一个又粗又大的煤箕子，箕子上再加一个大筐，足有半人多高三百多斤重，从清早到傍晚，一趟紧接一趟地往火車头上上煤。有时候，把头們故意把上工的钟往前拨，把下工的钟又往后拨。让工人多干活，多迟到；他們多罰你，喝飽你的血。李全德沒有一个月拿到过整整九元的工資，这怎样能养活奶奶和妻子呢。穷人为啥这样苦，官僚、地主为啥那样狠，李全德在貧困生活的煎熬中，时常为这个问题納悶。

一九二二年。有一天上午，李全德正在煤台上抬煤，工人苏长德对他說：“咱們工人的俱乐部在玉庆里成立啦！”年青的李全德，心里暗想：工人俱乐部大概是叫工人玩乐的地方。下了班，便乐滋滋地和苏长德跑去了。一进俱乐部，他見有的工人在敲鼓打鑼，有的工人在說笑。都是自己穷哥們。从此，他慢慢地恋住了俱乐部。

后来，他有了新发现，見到后廂房里經常有人出出进进。其中有他认得的年长工人高彬、司文德。經介紹他認識了一位姓李的同志，知道李同志是中国劳动組合書記部的，专门来这里帮助工人成立俱乐部和工会。和这些人的接触中，他开始听到了“阶级”、“剝削”一类新名詞。

当时，京汉铁路还有外国人。在郑州机厂就有一个外国稽查叫埃司朋，終天騎在工人头上作威作福，一个月竟拿八百元的高薪。“干重活的拿錢少，不干活的拿錢非常多，不

正是剝削！”李全德琢磨李同志讲的资本家剝削工人的道理。他心里亮堂了，也开始这样想：“人穷原来不是命中注定。”这个穷苦的硬汉子，从这时起，心中开始燃起了革命的火焰。

京汉铁路郑州分工会成立后，李全德抢先报名参加了工会，以后又加入了工人糾察队，和同伴們在俱乐部里担負起了保卫工会的任务：沒有生人来，就在前厅敲鑼打鼓，一見生人来立刻把鑼鼓煞住。他們不是在娱乐，而是奏着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雄壮序曲。

罢 工

一个震撼世界的大罢工斗争终于来临了。

一九二三年二月一日的头一天夜里，李全德接受了战斗任务，要在第二天八点钟护送京汉铁路的工人代表，到普乐园宣布成立京汉铁路总工会。

正是旧历腊月的寒夜，紧张而兴奋的心情使他翻来复去不能入睡。他深深感到，在这个世界上，穷人要想活着就要去斗争；只有团结起来向阶级敌人进行不屈的斗争，才能闖出一条活路。天刚麻麻亮，他就披衣起床，精神抖擞地来到車站票房門口集合。人越来越多，浩浩蕩蕩沿大同路向普乐园挺进。李全德走在队伍的左側。

队伍行至大同路的錢塘里口，吳佩孚的几百名軍警一齐出动了，荷枪实弹企图阻止工人开会。刹时，大同路一街兩側的店鋪关门闭戶。李全德挺身于敌人枪刀之前，眼睛都紅了。他知道面前摆着一个死，但他坚定地想：死，正是为了

生存。只听一声令下：“冲啊！”李全德和大队人马在怒涛中冲上前去，拨开敌人的武器，涌进了普乐园，完成了护送代表的任务。

反动军阀吴佩孚破坏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消息传来后，激怒了全路工人。总工会命令二月四日全路举行总罢工。这天上午九点钟，郑州机厂提前拉了“喊”，停止了一切生产。

为了保卫罢工斗争的胜利，李全德参加了工人敢死队，担负罢工保卫工作，谁敢破坏罢工，就向谁斗争。

二月五日，是罢工的第二天。下午，李全德背着粪筐，扮作农民模样，从家里走出来执行保卫罢工的任务。他走到一马路的时候，看见伪商会的几个乡丁和狗腿子，打着锣，吆喝着：

“京汉铁路的工人听着，你们如不马上复工，就把你们赶出郑州五里以外，不给饭吃，不给水喝……”

他一听气得不行。心中暗骂：狗日的，我们工人不做工，农民不种田，看谁给你饭吃，谁给你水喝！

走到郑州机厂，一看烟囱没有一丝青烟，机车不声不响，心里着实高兴。可是走到了他长年累月受剥削、受欺凌的装煤台的跟前，却突然发现几个鬼鬼祟祟的人，李全德随手将毡帽往下一拉，只露出一双眼睛，往前走去，想看个究竟。这时他听到工贼熊广仁对招来的几个二流子说：

“咱们今天对付着将车头开出去，工人们见了会来上工的。段长说了，事成有赏。”

李全德止不住心头的激怒，顺手捞起一根杠子，一个箭步跃到熊广仁跟前，大声吼道：

“熊广仁！你这个孬种，你敢破坏罢工，想升官发财

呀？”

起初，熊广仁误认为是个农民，不在乎。但是，当他看出是李全德时，立刻面如土色，拔脚就跑。几个招来的二流子，见头目已跑，也趁势溜走了。



复 仇

为了保存革命力量，罢工在遭到吴佩孚的大屠杀后，党号召工人们忍痛复工，以便组织革命新高潮。

李全德和阶级弟兄们含着眼泪上了工。吴佩孚一面假仁假义向工人表示既往不咎，另一面却派武装进驻京汉铁路各要害部门，镇压工人，迫害工会的积极分子。一天下工，钳工马定清和大家一起走出了车间，边走边嚼着馍，这时候迎面走来伪副段长陈党（工人称他狗熊）和伪警务段长胡鸿章（工人称他胡扒皮）。陈党一见马定清，就向胡扒皮一指。胡扒皮狐狸眼一楞，上前一把握住了马定清的领口。

“嘴里是什么？”

没等马定清辩说，胡扒皮另一只手猛插进马定清的嘴里，

用劲挖出了馍。接着就不容分说地打得馬定清鼻口流血。

工人们连吃饭的权利也没有了。

李全德和馬定清都是工会的糾察队员，是肩并肩的战友。李全德看到阶级弟兄受凌辱，十分恼火，决心要报这个仇。

一九二五年的夏天，郑州机厂整整一个半月没有给工人工资，许多人早已揭不开锅了。

“找段长要钱！”全厂几百名工人蜂拥到伪段长陈文喜的公事房门前，要工资！要饭吃！

陈文喜看到来势不妙，要工人们派代表到办公室里交涉。工人推出两个代表，一个叫魏世杰，一个便是李全德。他们受着工人弟兄的委托，昂首阔步走进伪段长公事房。李全德没等伪段长开口，就劈头问道：

“有人干活，就没有人管饭？”

“上头不给钱，我也没办法。”

“段上的事你应该负责。你不发钱，上午工人都上你家吃饭，你吃啥，大家吃啥，要是你也吃不上饭，大家饿肚子也可以上工！”

“再等七天就开支。”陈文喜看着赖不下去就推辞说。

“不行！五十二天不开支，不是要饿死工人吗？”

“明天先借给每个工人三块钱。”

“不行！今天就揭不开锅。”

陈文喜实在赖不下去了，才不得不答应，当天下午暂发给每个工人三块钱工资，三天后工资全部发完。这场斗争胜利了。

这一年的旧历腊月末，厂里又不给工人发工资了。工人

們派代表向偽河南督軍請願，反动当局才拨了一部分錢发工資。可是工資拨到厂里以后，副段长陈党偏偏坚持要先开足偽職員的工資，后发工人工資，錢不够就少給工人发。

偽職員一月的工資都是百儿八十元的，他們有吃有喝。工人一月的工資才几个錢呵！大伙听了十分惱怒，个个要求与陈党算賬。

“打陈党！”工人們交头接耳，传送着这个秘密的消息。李全德一听要打陈党，高兴极了，心想：狗日的，这回让你知道知道工人的厉害。要打就拉到院里狠打。下工的“喊”一拉响，陈党还没有来得及开，几百名工人已經把他围得水泄不通了。为首的几个工人，要陈党把发工資的事讲給大家。这个平时一贯欺压工人的豺狼，仍旧沒有把工人放在眼里，他挺着身子要給工人們講話。这时，群情激憤，怒不可遏，只听得齐声喊“打！”几十双劳动者的手朝他的头上打来。陈党双手抱紧头，哀求饒命。

“按倒狠揍！”工人們七手八脚地把陈党按了个嘴啃泥，用鉄棍子朝他的屁股上狠打一陣，这家伙，被打得話不能說，身不能动，活像一只死猪。

这一頓打真灵驗，当天下午厂里如数給工人发了工資。

坐 牢

当时京汉鐵路局局长赵继賢，是有名的劊子手。他为了鎮压工人斗争，拍电报給偽段长，叫他立即逮捕李全德等三十二个人。伺候偽段长的高老孩，是位老工人，他冒着生命危险，跑到煤台，把这个消息悄悄地告訴了李全德。

敌人行动得很快。李全德刚刚回到家里，反动军警就破门而入，四颗枪对准了他的胸膛。李全德被五花大绑，关进了伪警务段阴暗、潮湿、臭气难闻的牢房。

一个月后，李全德被押到北京。李全德在北京照旧带着沉重的脚镣、手铐，关押在阴森、死寂的牢房里，忍受着熬煎。

一次，开庭审他。李全德拖着大镣，气昂昂地对着审问他的人。那个人眯着一双眼睛，装着猫哭老鼠的样子，梦想诱李全德上钩招供，出卖阶级弟兄。

“办工会都是谁呀？谁打的段长呀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！”李全德回答得十分干脆。

“你好好说来，不判你的罪，让你回家团圆呀。”

“我不知道！”李全德声音响亮、坚定，他早看透了敌人的圈套。第一次“审讯”就这样结束了。在漫长的牢狱生活中，李全德不知多少次想到过“二七”罢工斗争和江岸惨案，他仿佛看到无数的阶级弟兄壮烈地倒下去。他多次回答

自己：祥谦同志为无产阶级事业，头可断，血可流，誓死不屈；李全德死也不会出卖一个阶级弟兄。他嘱托随他去北京的一位熟人说：

“过罢第二堂，你给我买一条席，收了尸，回郑州对你嫂子（指自己的妻子）说，



让她另找碗飯吃！”

第二次“审問”，那个人除了引誘又加上了威胁，李全德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，根本不把他的威胁放在眼里。

“想好了沒有？誰打的？”

“不知道！”

“不是不知道，是不愿意說呀！”那个人眼里噴出了凶光，大发雷霆地把桌子一拍，吼道：

“不承认呀！先抽你五百皮鞭！”

“別說打五百，就是把头拿下来，沒打还是沒打。你一定要說我打了，就把陈党叫来，当堂驗伤，有伤有据，我知罪，无伤无据是誣告，他得反坐！”李全德义正詞严地加以駁斥。他清楚：打陈党已經事隔半年，而且是隔着衣服打的下部，无伤可驗，无据可查。这时，审問的人十分狠狈，額上冒出一层层的汗水，足有一刻来钟，說不出話。第二次“审問”就这样結束了。

反动派要謀杀这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，但是軟硬兼施都无济于事，名不正，言不順，反动派怕再次激起工人們的怒火，不敢下手。过了許多天，伪京汉鐵路局警务处只好将李全德押回郑州，交給郑州的警务段发落。李全德坐了几个月牢獄，經過了一次又一次的坚决的斗争，終于出獄了。但从此他被开除了，过起了流浪生活。

李全德失业后，暂时在一位本家开办的軋面鋪里落脚。一天，他正为一家四口人的生活忧虑，一位战友把三十块銀元，递到了他的手里。

“这是党給失业工人謀生的！”送錢人交代。

党！李全德这个連枪刀酷刑也恫吓不倒的革命硬汉子，

热泪盈眶了。他再次深深体会到党的温暖，认清了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人民，救中国。

一天傍晚，李全德在老坟岗，突然看见了他的战友刘桐。刘桐是郑州分工会的庶务副主任，也因被通缉流离失所。俩人相见，一股火热的、强烈的阶级感情，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了。刘桐关怀地问李全德：

“听说你坐牢了？”

“没啥，反动派没有拔我一根汗毛！”李全德很乐观地回答。接着，李全德把自己的棉袄脱下来给病中的刘桐披上。随后就和他一起回到了老家郑州市郊老鸦陈。

一天，李全德又想到在郑州受苦受难和被关在牢狱里的阶级弟兄们，于是就对刘桐说：

“是不是进城看看有啥风声没有？”

这话同出一颗心肠。刘桐速速进得城来。他行至长春桥头，只见血淋淋两颗人头高悬在电线杆上，那个不是汪胜友？那个不是司文德？是汪胜友，也是司文德。刘桐熟悉自己战友的面孔，但他的眼睛早已经模糊了。看到战友们惨遭屠杀的情景，刘桐咬牙切齿地转回老鸦陈。

这是一九二六年的事。吴佩孚被北伐军打得丢盔弃甲，已是日暮途穷。可是，吴佩孚在这时候也正像一只待毙的疯狗，到处捕人杀人，企图挽救他的命运。

接着，敌人一趟又一趟直奔老鸦陈，指名逮捕李全德和刘桐。

李全德和刘桐，被逼得有好几夜不敢在家里住宿。在群众的掩护下，敌人没有抓到李全德，也休想抓到刘桐。

新 生

天亮了。重重压在劳动人民头上的帝、官、封三座大山分崩瓦解，人民获得了解放，李全德获得了新生。

郑州解放的前夕，李全德从早到晚和大伙一起参加护厂斗争。一九四九年，李全德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党的旗帜下，他庄严宣誓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！工人们推选他为郑州机务段工会副主席，他在党的关怀培养下，随后又提拔为郑州铁路区工会劳保部副部长。十几年来，他一直勤勤恳恳地工作着。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下旬，有一天正下着大雪，孟庙车站来了电话说：风雪交加，有一幢职工住宅倒塌了，十几户职工家属无处安身。他知道这个消息后，立即询问职工家属有受伤的没有，并要亲自去孟庙车站。机关的领导同志考虑到他的年纪较大，道路又很泥濘，怕他在路上摔倒了，劝他不要去。但是李全德同志，不声不响地找了一根树枝当拐杖，乘火车往孟庙去了。到了孟庙站一下车就去慰问职工和家属，并联系有关部门对他们的吃住等问题妥善地作了安排。

领导上为了照顾他，曾经几次给他分配新住宅，他一次又一次地让给别的工人同志住。他常常对同志们说：“解放前工人受反动派压迫，现在我们当了干部，就要好好为大家办事，方便尽量让给群众！”

近几年来，李全德同志不断向年青一代讲述“二七”革命斗争壮烈史迹，多少年青人从他的身上看到了无产阶级坚贞不拔，敢于斗争，敢于胜利的旺盛的生命力。

（傅凌云插图）

責任編輯：章 靖 馬 婧 李 責任校對：東 陽 封面設計：邊含真